

延安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

领导方法



88350

A84
59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F68/20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方法

主 编 宋 柏

编写者 宋 柏 刘维林

孙奎贞 何晓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方法

主 编 宋 柏

编写者 宋 柏 刘维林

孙奎贞 何晓莉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印张 6插页 159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19—5135—8/G·4422

定 价: 9.6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总序

DF68/20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

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的不良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革命领袖重视领导方法	(1)
第二节 科学领导方法的建立	(6)
第三节 科学领导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13)
第二章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17)
第一节 领导工作的根本原则	(17)
第二节 学习理论,把握国情	(20)
第三节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29)
第四节 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36)
第三章 一切从实际出发	(39)
第一节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39)
第二节 不掌握规律就无法做好领导工作	(48)
第三节 发扬自觉的能动性	(54)
第四节 不同问题用不同方法解决	(63)
第四章 调查研究	(72)
第一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72)
第二节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77)
第三节 调查研究的方法	(81)

第五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87)
第一节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	(87)
第二节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95)
第三节 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102)
第四节 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108)
第六章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114)
第一节 一切工作必须应用的基本方法	(114)
第二节 一般号召的形成	(117)
第三节 突破一点,推动全盘	(122)
第四节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131)
第七章 抓紧中心工作	(135)
第一节 主要矛盾理论的具体应用	(135)
第二节 统筹全局,决定工作中心	(138)
第三节 突出重点,带动一般	(145)
第八章 掌握政策	(155)
第一节 正确制定政策	(155)
第二节 掌握政策是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	(160)
第三节 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	(167)
第九章 民主和集中	(174)
第一节 发扬民主,倾听意见	(174)
第二节 加强集中领导	(178)
第三节 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182)
第四节 正确处理集中和分散的关系	(186)
第十章 培养和使用干部	(189)
第一节 全党都要重视干部工作	(189)
第二节 对干部素质的要求	(191)

第三节	对干部的考察培养.....	(200)
第四节	反对宗派主义倾向.....	(206)
后 记		(20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革命领袖重视领导方法

革命和建设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共产党领导群众向反动制度进行斗争,不但要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还要采取科学的领导方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取得胜利。列宁说过:“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①毛泽东也说过:“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②在艰苦的斗争中,创造并运用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领导第一国际的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

革命实践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活动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方法。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只能逐步地改造社会,并且提出了在现有条件中产生的十项主要措施,而这些措施也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决议。”在《论权威》中,明确指出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的必要性。恩格斯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也说道:“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那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做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①

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十分注意领导方法,列宁多次谈到抓主要环节问题。1901年,列宁在《从何着手》中提出要抓创办全俄政治报这个主要环节,认为这“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② 在《怎么办?》中,列宁在谈到火星报时,再次强调指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5卷,第6页。

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① 列宁在1918年4月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结，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1921年11月，列宁回顾上述文章后说：“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② 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11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再一次强调：“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抓哪个环节。”并且具体分析了1917年的关键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武装抵抗；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因此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纪律；“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③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371—3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7—108页。

列宁认为,正确地检查执行情况是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的最好的方法。他在1922年1月24日写给瞿鲁巴的信中说:“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最根本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同年2月27日,他给瞿鲁巴的信中再次提到:“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颁布法令,不是改组,而是选拔人才,建立个人对所作的工作负责的制度,检查实际工作。不这样做,就无法克服窒息着我们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列宁不止一次地考虑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建立一个最简便的有效制度来检查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了解如何执行的,何人、何时执行的。为了便于监督人民委员会机关中各部门工作的执行情况,规定应该把材料送到秘书处的准确时间记录下来。列宁还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例会上提出并经会议决定:每一个部门对秘书处查询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议的情况,不仅应该作出答复,而且必要时还要尽可能提供证据。列宁还关心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1922年4月11日,他起草的《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的决定》,专门有一节讲副主席的工作方法。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中,具体指出:“鉴于改善和整顿整个机关比主持会议以及同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谈话这类工作更为重要,而这类工作至今占用了各副主席的所有时间,因此必须规定并严格实行:每位副主席每周‘下底层’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亲自对机关上层和基层五花八门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考察。”

列宁在逝世前写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重要文章,提出了革新国家机关、提高机关工作质

量等重大问题,以及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基本部分结合起来的建议。他十分关心国家机关人才的培养,提出:“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无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①

斯大林也十分注意领导方法,他除了在一些著作中阐发列宁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外,还直接讲了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的结果;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非要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② 他还把检查工作列为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指出:“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③ 在联共党第17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一再指出检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斗争中有决定的意义。领导机关的决议是在执行呢,还是被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搁置起来了?这些决议是在正确地执行呢,还是被歪曲了?机关是在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工作呢,还是在空忙一阵?——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0页。

② 《斯大林文选》,第145—146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13页。

这一切只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才能及时地知道。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这是随时帮助查明机关的工作状况并揭发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的探照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缺点和缺陷十分之九是由于对执行情况缺乏正确的检查而产生的。毫无疑问,如果对执行情况有这样的检查,缺点和缺陷是一定能够防止的。”“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要达到目的,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必须是经常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第二,在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各个环节中领导对执行情况的检查的必须不是次要的人,而是有充分威信的人,即各个组织的领导者自己。”^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经常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所引用和阐发,成为他们建立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科学领导方法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方针,而且总结历史经验,建立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

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他明确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8页。

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① 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到湖南做了 32 天调查,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锋相对地答复了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典范。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多次提倡干部注意工作方法。1929 年,他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案,明确提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这个决议案里,还具体分析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研究士兵政治训练中政治课的教授法以及个别谈话法,等等。在 1930 年 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并且总结了调查的技术。1931 年 4 月 2 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做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 1927 年到 1934 年,毛泽东亲自在湖南和苏区进行农村调查,积累了十分珍贵的材料,做为制订政策的基础。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 页。

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1935年10月,党中央移到陕北。毛泽东在12月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本书不仅讲了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灵活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于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也有指导意义。1937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专门给干部讲了辩证唯物论,其中《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分,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1941年3月,《农村调查》正式出版,毛泽东说:“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打倒主观主义

的问题。1941年8月1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指出不懂辩证法,不做调查研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不但要亡党亡国,而且要亡头。1942年2月,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就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做了报告,连讲几天,主要讲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1943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作为中央决定发布。这个决定系统地总结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领导方法,号召“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的领导水平。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了我们党关于领导工作的经验,并把它化为广大干部都能领会和掌握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迅速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我们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领导方法建立的标志。

科学领导方法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领导方法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刘少奇的《论党》、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朱德的《关于练兵和带兵问题》、任弼时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陈云的《学会领导方法》、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等,在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理论宝库中也占有应有地位。

建国前后,毛泽东仍十分注意领导方法问题。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除了会议报告外,在会议结论中专

门讲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些工作方法是：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毛泽东还指出：“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讲的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理论原则和工作任务，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1959年2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和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提出了工作方法问题。在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工作方法十六条。1961年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央决定将最近发现的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发给全党上级及中级干部学习。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不少领导方法，其中如一切经过试验，推广种试验田的方法；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抓两头带中间；冷热结合，等等，至今对我们的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这个时期也提出了有关领导方法的问

题。刘少奇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周恩来的《加强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陈云的《做好商业工作》、《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领导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倡导的领导方法,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它所以是科学的,因为这种方法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正确的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领导方法是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多年酝酿、探索和总结,最后在延安形成的。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十分重视学习和运用科学领导方法,认为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这个领导方法一经为广大干部所掌握,就成为巨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科学领导方法有以下特点,明确这些特点,有助于对这种方法的学习、领会和掌握:

第一,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立场一般是指无产阶级和党的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① 观点一般是指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② 方法是指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站在无产阶级和党的立场,有了坚定明确的群众观点,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法,才能明确是非标准,群众路线,正确分析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第二,思想方法、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统一。思想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决定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决定干部的领导方法。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在领导工作中就会自觉地培养和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也就会自觉地实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方法。

第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性要求坚持革命的方向,坚持运动的方向,具有确定不移的目标。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容许有灵活性。例如,发动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总的方向,但在具体实践中,使领导者的觉悟变为群众的觉悟,就有个宣传教育的过程,组织的过程,有时还有等待群众觉悟的过程。在不同地区,老区、半老区、新解放区都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步骤和方法,这就要有灵活性。“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①

第四,高度的理论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统一。科学领导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例如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群众路线、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等方法统一起来,具有高度的理论性。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抽象的高不可攀的理论,而是具有中国特色和实践特点,有极易为干部掌握的可操作性。《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就是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统一的典范。当然,这种可操作性不是不问对象、不顾条件地乱用,而是掌握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98页。

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根据客观规律,做好领导工作,反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第三节 科学领导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科学领导方法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点。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要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①又说:“我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②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42页。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对于毛泽东思想，不仅要继承、坚持，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 他又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②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和实施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重大决策，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陈云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观点。建国后，他在财经工作的实践中，把认识真理的方法概括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他强调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主张“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他在1987年7月讲的《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中说：“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09页。

论,就是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他还说:“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驳倒错误意见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陈云的观点和意见,是对毛泽东的科学领导方法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提倡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科学领导方法,反对否定或贬低科学领导方法的论调。有人认为,只有西方的决策理论才是科学,主张照抄和搬用,而对传统的领导方法则认为不科学,甚至扣上“经验型”的帽子。当然,对于外国的有关科学成果,包括系统论等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和借鉴,但必须以我为主,不能用这些理论来取代中国的科学领导方法。科学领导方法的基本部分,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等,已经教育了一两代革命干部,在广大干部中生了根,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估价,不能妄自菲薄。

还有人认为,在新形势下过去在农村环境采用的领导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甚至认为是手工业式的。目前我们工作局面更大,了解情况的手段更先进,统计资料更完备,可以在决策中采用计算机配合问题调查等方法,但这些都代替不了面向群众、深入基层。决不能因为有了现代化手段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发指示、解决问题。开调查会、抓典型等方法不能否定。特别是这些方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向群众学习,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正确地了解

情况,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动员和组织群众促其实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要在领导工作中牢记这些基本原则,做为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好用好。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认真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努力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的科学领导方法,紧密联系群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第一节 领导工作的根本原则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作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是实践这种结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反复强调了坚持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并从主观上努力实现这种结合。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时期。这种形成、发展、成熟并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依据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实现

这种结合的道路和方法,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一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肯定下来,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毛泽东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或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作的高度概括,集中体现在他于 1941 年 5 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毛泽东首先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作为对我们党 20 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肯定下来,表明它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他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通俗而深刻地道出了这一原则的应有内涵及其要求;再次,他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同实事求是内在地联系起来,表明二者是同一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把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

早在 30 年代,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就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了重要论述。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延安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1945年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之一,认为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因为只有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中国革命才有明确的目标而不致迷失方向;只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的放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才能使两者的结合有坚实而丰厚的基础,真正实现这种结合。

我们做好领导工作的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理论和实际分离。“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具有这种态度和方法,才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保证。违反这种态度和方法,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地研究和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于具体环境和情况,不做周密的调查研究,仅凭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只能脱离群众,贻误工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毛泽东提出的领导方法,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方法。学习和运用这些方法,也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群众路线、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抓中心工作等领导方法,和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反对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机械地搬用。“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①

第二节 学习理论,把握国情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在他所作的报告和文章中,都强调了全党要注重学习、善于学习的问题。学习内容包括理论学习、历史学习、文化科学学习等方面,但主要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毛泽东强调全党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

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①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学习的重视和强调,促成了全党的一次学习运动,从而推动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由自发上升到自觉,端正了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巩固、壮大革命队伍,战胜敌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学习的重视和强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强调全党都要学习,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根据自己学习的经验体会,尤其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号召全党都要学习,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开展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

第二,强调学习要由自发变为自觉。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等文章中,都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理论要充当革命运动的向导”,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由自发到自觉,只有自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思想。

第三,特别强调学习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为解决问题而学习。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了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第四,强调学习要抓住最实质的东西。例如,毛泽东一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限于背诵它的个别词句,不是看读了多少书,主要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1941年9月29日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信中,作为中央研究组组长的毛泽东明确提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著《新哲学大纲》、李达译《辩证唯物论教程》、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的有关部分。

第五,强调学习要达到目的,取得好效果,必须通过一定的活动方式。延安时期,虽然是我们党和军队最困难的时期,要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和加强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和领导下,党还是以极大的决心,抽出专门时间,投入很大力量,开展声势浩大、普及全党的“学习、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为把学习任务

落到实处,创造性地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例如,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和9月分别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指导。对中央学习组、高级学习组的学习内容、要求等等,毛泽东都亲自过问和指导。另外,毛泽东还经常到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等处作学习动员或报告。通过这样一些活动方式,使全党的学习得到进一步深化和落实。

第六,强调学习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注意学习效果。毛泽东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方面,一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开始在城市研究工人运动,以后到乡村研究农民运动,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

毛泽东对理论学习的重视和强调,体现了全党的智慧、意志和要求。延安时期,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任弼时、张闻天等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是统一的,一致的。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认为正确的领导者必须经过实际调查,使当地的特点与党的任务联系起来,以确定每一个时期的任务和方针,规定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并从实践中检验党的路线和策略是否正确。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共产党员应当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它的精神实质,不以背诵马列主义的语句、结论为满足,而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导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自己。文章还论述了无产阶级立场和学习理论的关系,指出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

学习马列主义,就会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学会领导方法》和《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文章中,都强调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学习的重视和强调,代表的不单单是他个人,而是党的领导集体,乃至全党的共识和意志。

深入了解和把握实际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把握,那么再好的理论都将失去意义,当然就更谈不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早期,就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延安时期,仍一以贯之,并做得更深入。可以说,延安时期开始形成并成熟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根本特点,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际之上的,是建立在对国情、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因此,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既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决条件,也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更是每一个领导者做好工作的最根本前提。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不止一处地提到,我们的党什么时候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认识了解得不够,我们的党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就不能很好地领导革命;什么时候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队伍就能巩固、就能发展。一部分同志曾在

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实际”的主要内容。只有深入了解和把握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才能使理论与之真正统一和结合，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历史状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中国历史，对中国历史抱有浓烈的兴趣和偏好，由于潜心钻研，常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则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历史，并且把这种观察、分析来的结论用于现时情况的说明，用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毛泽东认为，既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停留在一些孤零零的事件、人物、材料，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要按历史本来的面目，把它连贯起来，掌握它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像纯理性主义者那样，不分主次先后，只注意到一般，忽视了特殊和区别，而要科学、合理地划分出不同

阶级,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在把握了中国历史的一般特点以后,越到后来,越强调近代中国的特点和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现时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与作用。我们注意到,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中,毛泽东讲到中国历史状况时,讲的几乎都是中国近代史的状况,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现代、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的是要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状况。例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讲到当前的几项任务时专门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第二,要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的社会状况。这里所说的中国的社会状况,主要是指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尤其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和阶级构成情况。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的社会状况,是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对象、任务等的直接依据。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的:“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初期,就对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尤其是阶级构成情况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延安时期,则在原有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系统化,并将其直接作为论证中国革命一些重大基本问题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例如,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直接奠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分析之上的。毛泽东先是全面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才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任务,并同时论证说明,由中国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中国也不可能马上进入到社会主义,只能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概括与创造,也完全是以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认识为主线,通过对这种认识进展情况的分析达到的;包括发动全党中的学习运动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都是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阶级结构、队伍人员构成状况的分析之上的。

第三,要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专门用一节讲“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而发生的又一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策略和方针。那么,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并且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 and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正是基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这种分析,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等一些基本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突出的是民族矛盾、民族战争。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全力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将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及方针置于这种可靠的分析、研究基础上。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着重分析了“问题的根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接着他具体分析了战争双方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在此基础上,他做出结论,“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第四,要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革命的规律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各种不同要素间存在着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就是要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例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我们党 18 年的斗争史时指出:“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 1924 年至 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1927 年至 1937 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但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另外,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

争、党的建设也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其规律性。所以，毛泽东总结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为了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国情，就要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对客观情况、客观对象、周围环境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与研究是毛泽东历来主张和提倡的。

毛泽东同志郑重提议：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三节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在党的历史上,经历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苦的探索,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只有到了延安时期,才实现了这种结合,引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对这个结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教育全党,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认识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客观世界,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关于怎样才算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什么人才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也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

关于用理论改造客观世界，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引用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也证明，只有当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时候，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了解和把握实际时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也要求通过革命实践的概括和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到，在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例如，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高度评价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

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现在,我们党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根本的要靠实践。实践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相结合的桥梁或中介,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或结合都统一于实践过程之中,只有通过干,通过实践,才有新理论的产生,才有对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否则,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是一句空话。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对实践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概括和阐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则从历史的角度,对我们党 18 年的斗争实践,对这一斗争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如何不断地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了深刻、全面的总结和概括。另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文章中，毛泽东则对如何在战争实践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或结合作了系统的阐述。总之，只有在实践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有具体内容、具体形式。理论是实践所需要的理论，实际是实践过程中的实际，实践的成败决定着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好坏，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实践过程的不断深化，推动着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到延安时期开始成熟，毛泽东思想到延安时期开始形成和成熟，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一步步完善的结果。因此，实践是实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或相结合的唯一的根本的途径。

实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或相结合，既要靠实践，又要靠群众。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相通的。因为离开了人民群众，既不会有正确的理论产生，也不会有对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离开了群众路线，理论要与实际相联系、相结合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事业。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思想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

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的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全党全国瞩目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问题，做了系统的回答，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发展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创造性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许多战略战术原则。根据十年血战史的经验，提出了下述原则：“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严肃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页。

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①又指出：“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②

毛泽东领导全党从1942年开始进行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通过整风运动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在整风运动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叫“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解决矛盾，达到全党团结的目的。整风运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这是他的首创。

这里只举了部分例证，其他如统一战线等方面，毛泽东也创立了独特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策略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③“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进一步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1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7页。

解放。”^①

第四节 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与理论联系实际是格格不入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正是在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片面性中实现的。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经验主义者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轻视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作用,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因而是狭隘的,片面的。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因此,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经验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了大多数,他们有革命的积极性,但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思想理论水平不高,加之在战争环境中,面对几个方面的敌人,无暇抽出时间进行专门系统的学习。当然,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也给一些缺乏辨识、分析能力的人找到了轻视理论、排斥理论的借口,于是他们就走向极端,导致经验主义。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17页。

但毛泽东强调指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别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对教条主义的特点,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作了大量的论述。他说,教条主义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教条主义者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

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把教条主义作为重点来反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教条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根深蒂固，很多人中毒很深。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曾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打着革命的旗号，唯我至尊，唯我正确，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内有国民党反动派，如果对教条主义，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不给以彻底清算，全党的认识就不能统一，步伐就不能一致，队伍就不能团结和稳固，正确路线就确定不起来。这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全党的学习运动——延安整风的主要根据。对我们至今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第三章 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一节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毛泽东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本本出发、从定义出发,这是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基本分歧。

首先,从实际出发,是要从离开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方法论结论。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真实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毛泽东说:“除了我们的头脑之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

其次,从实际出发,必须从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出发。因为“实际”是处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研究战争的时候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② 研究战争是如此,做其他事情也是如此。能否着眼于发展,是能否做到从实际出发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3—194页。

一个重要问题。思想落后于实际,行为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而前进;或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行动上盲目冒进,都是不从实际出发的表现。所以,从实际出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的发展观。

毛泽东能够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上为我们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保证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分析实际情况的时候,能够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作出新的判断,正确地认识新情况。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就是坚持这种科学态度的一个范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独占和灭亡中国的武装侵略,引起了中国广大爱国同胞的无比愤慨,抗日怒潮迅速席卷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方面的重大变化。1935年的华北事件,进一步引起了国际形势与国内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矛盾。中国人民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也有所缓和。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这种新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形势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分析,对党的政治路线作适时的转变,迅速建立起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适应这种变化的新形势,1935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转变作了理论概括与说明。报告分析了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肯定了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抗日的最基本力量,指出在当时的形势下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提出了“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分裂的”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强调必须争取地主买办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科学地阐明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同时深刻分析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再次,从实际出发,要从全面的客观情况出发。毛泽东强调,实际是全面的,要全面地看问题,从事实的全部情况出发,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引用列宁的话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这就告诉我们,“实际”应该是全面的客观情况,而不是事物的某个侧面、某个片断,或者某个个别实例。当然,客观事实是有不同侧面、若干片断和个别实例,但是,要把它们联系起来、综合起来,作为比较全面的、整体的东西,由此出发,作出判断,并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它们孤立起来、割裂开来,由此出发而获得认识,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 中国革命是在复杂的环境里和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认识 and 解决问题,就更需要分析全面的客观事实,抓住事实的一鳞半爪就作结论,非碰壁不可。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一部分人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事实,并把它夸大为全部问题的根据,因而得出了“亡国”的结论;另一部分人,则把中国的长处夸大到离开了真实情况的地步,忘记了敌强我弱,因而得出了“速胜”的结论。它们都把片面当成了全面,把树木当成了森林,所以其谬甚矣。而毛泽东则把中日两国的基本情况作了全面考察,写了《论持久战》这一伟大著作,批评了这种论调。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对比,指出日本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不能是速决战;他又根据敌退步我进步、敌是小国我是大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页。

国、敌寡助我多助的对比，指出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遭到最后失败，而中国决不会灭亡，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从这种全面的根据出发，毛泽东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论断。今天，这个论断的无比正确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第四；从实际出发，还要从不同事物的具体特点出发。因为实际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毛泽东指出：物质是运动的，但每一个运动形式都有它的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要认识物质的运动的特殊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不但要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尤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区别。所以，从实际出发，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的原则。

第五，一切从实际出发，还包括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出发。中国的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活动，共产党人的责任，也就在于立足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去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领导人民群众为完成革命事业的最终目标而奋斗。人类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不是经过一次社会实践就能完成，而必须通过反复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这就是说，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有些人在主观上也想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却轻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势必要背离唯物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出真知的观点，十分重视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他指出，一切理论都要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正确与错误。那些违背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主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他们之所以“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极端轻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们根本不懂

得“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①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②什么是国情？所谓国情，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基本状况，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实际。毛泽东把认清国情看成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深刻地说明了从实际出发的根本意义。这是一个完全科学的结论。任何革命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国情不同，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也就不同，革命的规律也就不同。因此，要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创立革命的理论，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就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能够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解决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内不少人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使革命成效甚少。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不甚了了，若明若暗。而毛泽东之所以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深知中国的国情，深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并能由此出发，以此为基本依据去认识问题。1940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文章一开头，毛泽东就强调，研究问题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解决中国革命诸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要研究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国革命的问题,首先就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说:“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一,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虽然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发展,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并未完全摧毁。无论是日本占领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国情。这种社会性质,意味着中国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乃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矛盾,而这一主要矛盾又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同时,这种社会性质,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中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即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两步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第二,世界革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全世界的革命是紧密联系着的。因此它的特点,不仅为中国社会所规定,而且为世界革命的发展所制约。中国的民主革命,按其对象和任务来说,理应属于一般的即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时代开始了。在这样的时代里,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

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它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它已经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不是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命，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

第三，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势力，是革命的敌人；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两重性的特点：一方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党对他们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组织纪律性。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这是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个基本问题。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一路线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和对象问题，从根本上批判了党内“左”右倾两种机会主义观点。

第四，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点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的基本点就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这一经济纲领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则是整个

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因而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的,而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特点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特点,即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从国体上说,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从政治上说,则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可以看出,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纲领,都具体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全然介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纲领,就必然也具有两重性的特征。

可见,认清中国的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是坚持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研究问题“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①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②毛泽东在同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83页。

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① 毛泽东在这里把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具体化了，把列宁所详细论述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变成了领导干部容易理解和掌握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为什么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因为实际情况是客观存在，又是第一性的，而工作方针，包括党的各种决策、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措施等等，对实际情况是第二性的，第二性的东西必须符合或正确地反映第一性的东西，才能指导人们把工作做好。想问题、办事情，只有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和满腔热情是不行的，必须尊重客观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才能把事情办好；反之，“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就是使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符合自己的主观愿意，这是本末倒置、闭门造车的办法，是按照列宁所尖锐批判过的“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办事的，凡是这样干的，没有不犯错误，不在实践中失败的。毛泽东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说是“应当引起全体同志的教训”。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究竟从什么出发，是从外国的经验出发，从本本出发，从原则出发，还是从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其复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出发，这是一场极其严肃和尖锐的斗争，斗争的成败，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着重批判了“忽视客观实际事物存在”的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轻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8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强调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了这一真理。”^① 因此,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没有从马恩列斯的“本本”出发,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我党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节 不掌握规律就无法做好领导工作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点。毛泽东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概括,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 可见,所谓实事求是的根本内容,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从事物自身寻求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能否在各项工作中切实做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关系到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为了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批判在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在延安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战争问题,写了《中国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军事著作，系统地揭示了战争发展的规律，阐明了按客观规律指导战争，办好一切事情的必要性。对于战争“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不仅战争如此，而且“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

首先，战争的规律是“战争的自然逻辑”，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是战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坚持战争规律的客观性，是坚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对战争的客观规律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② 他还特别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界的一种必然运动，”^③ 有其“战争的自然逻辑”，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指导战争，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研究战争规律，按战争的客观规律办事。

毛泽东把战争区分为一般战争、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把革命战争区分为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把中国革命战争区分为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把中国国内革命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又区分为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等。与此相对应,毛泽东把战争规律区分为一般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特别调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①毛泽东关于战争和战争规律多层次的理论,是唯物主义战争规律论,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

其次,要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就要从战争的具体情况出发,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区分不同战争在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反对战争上的机械论,这是因为,战争总是具体的,是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发生的。从时间上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不仅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特点,同一时期的各个阶段也各有其特点;从地域上说,各个国家、民族有自己的特点;从性质上说,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均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只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出发,研究其特点和发展变化,才能找出它的特殊规律。抽象地、机械地谈论和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是不可取的。

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四个特点：(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战术，而且也基本上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2)“敌人的强大”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不同。”(3)“红军的弱小”，表现在我们的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数量少、武器差、供给十分困难等。这个特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很快地战胜敌人。(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这使我们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威力，是我们能够以弱胜强的源泉，实行土地革命，使我们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援助，军队也有了物质上的保障。在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之后，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①他强调：“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②土地革命战争和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总结的这一规律的正确性。

再次，毛泽东不仅指出战争规律的客观性，而且还阐明了决定了战争规律的客观物质条件。他指出，战争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等各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客观的物质因素，不仅决定着战争的规律，而且还决定着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决定着战略战术，也决定着在战争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把影响和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

定中日战争的诸因素,概括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气候、战争的性质、国际援助等方面的情况。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决定战争的产生、进程和结局的一切客观条件。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作是战争的“五行素”即五个基础。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①可见,战争中的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着战略、战役、战斗的胜利与失败,是战争中生死攸关的问题。

战争中的诸因素和决定战争规律的各种客观物质条件,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战争的,是一种合力的表现。交战国双方的经济实力的对比、交战国双方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交战国双方的军队的数量与质量的对比以及交战国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等等,是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它们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所谓战争的客观规律,就是在战争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决定战争的每个因素都以其固有的本性作用于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必然会对战争规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战争规律是综合的表现,它具有完整性和整体性,是战争诸因素在战争发展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战争诸因素在战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表现出来的。它们只有作为一个合力,综合地作用于战争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时,才最终地决定着战争的特点、本质和性质,表现出战争发展的规律来。

第四,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必须经过战争实践。正确地认识和指导战争,就必须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指导战争同进行任何工作一样,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力求做到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符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革命

^① 《刘伯承用兵录》,第132页。

战争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战争的指导者是否遵循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或认识路线,能否做到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布署和指导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而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符合,具体到战争中来,“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①

要认识掌握战争规律,就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毛泽东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②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只有亲身参加实践才能获得真知。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脱离战争实践的人,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把握战争规律,成为一个能干的高级指挥员。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既没有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战争战斗实践的亲身经验,又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实质,盲目照搬外国的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否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战争中亲身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原则,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以到处碰壁。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也是一个过程,因而要真正认识战争,还必须通过战争实践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毛泽东深刻地发挥了列宁关于主观和客观的符合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把人的认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识过程分为计划建立之前的认识情况过程和计划建立之后的实行过程。在第一阶段,“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在第二阶段,则是将已经形成的判断、决心和计划等理性认识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其是否同客观实际相符。这一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来说,就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它比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意义更加重大,是检验和深化人们的认识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毛泽东还指出:由于战争双方是成群武装的活人,而又互相保守秘密,所以,指挥员的认识只能做到大体符合情况,即有决定意义的部分符合情况,那就为指导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至于主观与客观实际“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们所达到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真理,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追求什么完全绝对的真理,则是认识上的机械论。

第三节 发扬自觉的能动性

“自觉能动性”的概念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也称为“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作用。中国革命长期处在情况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杂、斗争艰难、敌强我弱、又缺少外援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要正确认识客观情况及其规律以外,还要求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军队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特别是在战争中,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更加需要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英勇精神。在总结革命战争胜败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从军事理论和科学理论上清算了“左”倾错误,形成了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又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全面论述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事实的能动性,形成了自觉能动性的系统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能动性理论与方法。

什么是自觉能动性?毛泽东说,一切事物都是要人去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理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 在这里,毛泽东将自觉能动性同一般能动性作了区分,并说明了自觉能动性的内容。

第一,自觉能动性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它包含着思想和行动两方面。人们在反映客观对象时,总是为着实践的需要,怀着一定的目的和动机。人们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先在头脑中形成所要达到的目的,制定出计划方案。在战争中,指挥员总是“根据客观事实”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去构造夺取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争胜利的思想蓝图。战争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思想蓝图和预定目的而展开的。

第二,自觉能动性,是人类所独有的特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所谓能动性,是指物体既能对于他物的作用作出相应的直接反映,又能主动地作用于他物,作出间接的反应。这种能动性是一切动物都有的,然而仅仅是动物的一种本能。人的能动性则不同,它是自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 恩格斯则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②

第三,自觉能动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自觉能动性不仅包括认识,更重要的还包括着实践,把主观蓝图转化为客观的现实。人们从主观现实中引出思想、计划的本身并不是目的,把思想、计划变为现实,也就是把客观改造成有利于人自身,才是目的。这是人的自觉性的最突出的表现。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③

自觉的能动性固然是每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的,但绝不是说,任何时代、任何人的自觉能动性都是一样的。对于同一客观事物,可能过去的人们无法认识,无法改造,而今天的人们却能够认识、能

① 《资本论》第1卷,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够改造。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有的人在实践中收效显著,有的人却收效甚微,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说明,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是有严格要求的。

首先,发扬自觉的能动性,可以认识事物及其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特殊形式,它也是可以被认识的。

然而,由于战争情况复杂,瞬息万变,敌我双方不但互相保密,而且互相诱骗;由于战争具有巨大的流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实性等特点,因而,古今中外,许多军事指挥家、理论家认为,战争根本无规律可言,不可捉摸,只能由偶然因素和主观意志去支配战争的命运。但也有军事家认为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就说过:“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① 认为战争中的敌我和天地变化都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我们能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掌握客观发展变化的情况,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高度赞赏孙武的这一观点,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② 尽管战争现象较之其他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其所以可能,是因为在战争的双方中,“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③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侦察手段的提高,又使战争的确实性的程度大大增加。只要充

① 《孙子》地形篇。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分运用各种侦察手段,收集情报,经过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做到符合客观实际,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就能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就能多打胜仗。

人和动物不同,它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具有理性思维能力,不仅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感知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而且能通过大脑的抽象思维活动,透过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毛泽东所说的“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种“改造制作功夫”和他常说的“思索”、“开动机器”,就是大脑的理性思维活动或理性认识活动,它的产物就是“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即抽象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的精神产品。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不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感觉不能把握它,它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和深层,只有人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它。这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

其次,自觉的能动性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人都有自觉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决不是主观任意的盲动性。毛泽东强调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就是说这种能动性必须建立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他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挥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这就说明,只有从实际出发,建立在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条件上的思想、计划、方案才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它具有客观必然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承认它,它存在,发生作用;你不承认它,它亦存在,亦发生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用。人们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必须顺应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军事家不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①又说:“人们的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②

再次,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在规律面前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③“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借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④在战争中,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是“主观力量的竞赛”,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武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充分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

人的自觉能动性不但可以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运用这种认识去改造客观事物,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自觉能动性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82页。

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立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

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有两层含义:(1)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比如,中国民主革命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遭受了挫折和失败,后来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使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说明,阶级、政党、领袖、革命理论等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个国家革命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自觉能动性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只有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这说明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在客观因素具备变化的可能性的条件下,主观努力、主观因素,在促成可能性变成现实方面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在客观可能性具备的条件下,自觉能动性才对认识的完成,对社会实践的进行,对事物的发展进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加速或延缓),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可能性不具备,自觉能动性再大,也无法创造出一个现实来。

第四,实践是实现和发扬自觉能动性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战争既然是有目的的活动,就必须通过具体的战斗去达到目的。为了消灭战争,只有去进行战争,为了消灭敌人,只有去进行战斗。因此,战争中自觉能动性实现的过程,就是战争的实践过程,通过实践,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完成战争的任务,实现战争的目的。离开战争实践,所谓的战略、战术、计划、方案,只能是镜花水月、纸上谈兵。

毛泽东在强调战争指挥员要充分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同时,又特别强调重视士兵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因为群众是实现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是实践的主体。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① 在《论持久战》中,他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还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采取措施,充分动员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战中去,把部队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高度结合起来,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还论述了自觉能动性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主动性,是指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主动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要在一定物质力量基础上去能动地争取的东西。“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478页。

努力的充实,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在优势条件下能否坚持主动,在劣势条件下能否争取主动,关键在于能否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力量强大的一方,如果对客观情况缺乏虚心的研究和正确的估计,势必计划不周,行动盲目,从而陷入被动。力量弱小者,若能认真研究敌我情况,从中引出行动的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避敌之强,击敌之弱,就能争得主动权。

灵活性,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还说:“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而且要经常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等。这些方法都是主动性的具体表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懂得具体作战的战术和方法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交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环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所以,他强调指出:“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①只要有这种“运用之妙”,在客观情况基础上,就能够改变敌我优劣之形势,实现对敌的主动权,压倒和击破敌人,夺取最后胜利。

计划性,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战争计划的重要性,他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预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② 战争指挥员应根据战争的相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5页。

确实性,制订相对固定的计划,又要根据战争的流动性,随时调整或改变计划,这样才能将战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当然,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要实现计划性于战争,同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物和工作比较起来,要困难得多。战争的指导者应根据战争的特点,尽可能地制定严密的计划。诸如,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置,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备,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应当仔细考虑、检查执行。“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

第四节 不同问题用不同方法解决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从理论上作了充分的论述,在实践中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矛盾的特殊性就是事物具有的特点,或者叫个性。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① 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握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确定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从而发现具体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认识这一事物。而且,从人类认识的程序来说,也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一般的事物的。离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认识就无由发生,也无由发展。

对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列宁是十分重视的,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①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能够始终根据这一方法去分析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因而无论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能正确认识问题,“料事如神”。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仅是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基础,而且是正确地解决问题的关键。毛泽东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②怎样确定解决不同矛盾的不同方法呢?关键就在于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把握矛盾的特殊本质,也就是找到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我们为什么要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为什么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共产党内的矛盾,我们为什么又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呢?这都是因为矛盾的性质不同、特点不同,所以采取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如果对这些矛盾的各自的特点不认识,也就不会有正确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中,我们党形成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量力而行、“对症下药”等一系列工作方法,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是按照辩证法办事的工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作方法。这正是我们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而那种看问题、办事情，不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用某种“公式”、“模式”乱套，搞“一刀切”、“一哄而起”的工作方法，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形而上学的东西，不仅做不好工作，反而会给工作造成损失。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研究它的特殊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切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 阶级产生之后，战争就产生了。战争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固有的一般规律。指挥战争者，无疑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战争中又有革命战争，世界各国都发生过大小无数次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相对于一般战争来说，又有其特殊的规律。革命者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就不可不研究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各国的革命战争，由于其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不同，又各自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朱德在谈到毛泽东的用兵新法时说过：“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科学方法论的用兵新法。”^② 这是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方法论的精辟而又通俗的概括。

那么，怎样具体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呢？

第一，要遵循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指出：“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② 《朱德选集》，第168页。

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① 恩格斯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② 列宁也指出过,对于辩证法应该加以客观地运用,而不能主观地去运用。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这些思想,他提出的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一定要避免主观随意性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要解决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只有把矛盾分析的方法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恰当地分析矛盾。

第二,要从五个层次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五个层次对矛盾特殊性进行了详细分析。(1)要分析每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有五种,即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它们互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要认识这些运动的各自规律,就必须研究它们各自的特点,认识他们各自的特殊本质。否则,就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就无法在各个领域中按规律办事。(2)要分析每个运动形式的每个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例如,在社会运动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各个历史过程,其矛盾都有其特殊性。只有认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才能采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9—470页。

正确的社会革命的方法。(3)要分析每个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例如,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各个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各有其特殊性。只有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4)要分析每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例如,中国民主革命自辛亥革命后,经历了若干阶段,特别是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这样两个大历史阶段,而这两个阶段的矛盾也都各有其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只有对后一个阶段革命所碰到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认识其特殊性,才能把握其规律,领导革命达到胜利。(5)要分析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例如,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两党这两个矛盾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党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了国共两党在各个时期的特殊情况,因而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第三,要分析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两类。同样,无论什么矛盾的双方,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时对立双方似乎势均力敌,其实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况,基本的形态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如果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种情形,那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①“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便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③

毛泽东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批判了主观主义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党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他们长期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拒绝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知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歪曲成抽象的公式、僵死不变的教条,甚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外国经验也都看成神圣不可改动的东西,一味地照抄照搬,结果既害了革命,也害了他们自己。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割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否认特殊,把一般绝对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327页。

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又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相比，出发点虽不同，但思想方法却是共同的，实际上他们是把狭隘的经验当做教条到处乱套，他们也是割裂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总体上，片面强调特殊，否认普遍，而在具体问题上，又把特殊当成普遍，把狭隘经验绝对化。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运用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光辉范例。它具体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以及它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具体地说，日本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强国，有强大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处于垂死没落的时代，由于内外矛盾，它一方面，对内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又是一个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民中灌输帝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就产生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特殊野蛮性。日本是一个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战争是在其先天不足的条件下进行的，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在国际上，它失道寡助。日本进攻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它虽然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却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又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还遭到许多国家的政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页。

和革命人民的反对。这样,日本就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支持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种反对力量,在战争中将逐渐增强。中国方面:我们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然而中国如旭日东升,处于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它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中国本身具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进步的因素,有了已经觉醒的广大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了数十年积累起来的革命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它又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在国际上,它得道多助。

毛泽东在对中日双方的特点进行分析和综合之后指出:必须承认,敌强我弱,我们不能速胜;又必须看到,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因素所减杀。我虽弱,但我之弱也为其他有利因素所补充。“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①因此,结论是: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具体分析抗日战争三个阶段中,中日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但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中国方面向下的变化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向上的变化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日本方面向下的变化表现为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战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区、人口和资源的扩大。第二阶段,中日双方的矛盾的诸因素将继续发生变化。即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则逐渐上升,日本则继续下降。中国开始脱出劣势,日本开始脱出优势,先达到平衡,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第三阶段,中国方面经过第二阶段长期的艰苦奋斗和准备,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国际援助等有利因素即向上因素更加增多,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变为我强敌弱,我开始举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章 调查研究

第一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①要了解情况，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

按照唯物主义的原理，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我们在工作中提出的道理、意见、计划、方针、政策，都必须根据客观事实或符合客观事实，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②以指挥战争为例，“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 所以,做好工作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矛盾的问题,也就是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问题。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主观和客观不一致,使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和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力求符合中国国情和当时、当地的实际,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从而,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的道路。在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使广大干部明确了主观主义的危害和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解决了主观思想同客观存在的关系。在具体工作中,深刻认识了只有主观思想完全适合所处的客观环境、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工作才能迅速见效;如果思想脱离客观实际,主观和客观不一致,做起工作就难免碰钉子,甚至根本没有效果。

怎样才能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首先要了解客观实际情况,这就需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桥梁或纽带。毛泽东说:“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

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①毛泽东反对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做调查,关起门来冥思苦索地“想办法”;反对不经过周密调查就发议论、提意见、“乱说一顿”的钦差大臣作风;反对做领导工作的干部遇到困难就唉声叹气,要求调动工作,而不能主动走出去,向实际调查,向群众请教;特别是反对理论与实际脱离的本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名言,成为广大干部掌握的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武器。

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调查研究首先要能摸到真实情况,对客观实际有个全面的、本质的认识,这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做到。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最了解也能反映真实的情况,群众在实践中又有生动、活泼的创造和经验,有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把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形成党的方针、政策,回到实践中去,指导革命斗争,并由实践加以检验,对的加以坚持和丰富,不尽完善的加以完善,错了的加以纠正。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个一次次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取得正确认识的过程,也是通过调查研究检验方针、政策的实践效果的过程。这样,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使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一致起来,使调查研究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

为广大干部必须学会和掌握的基本功。周恩来说：“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① 深刻地说明了这个真理。

毛泽东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② 一切实际工作者包括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无一例外。做为领导者，在制定政策、决定任务、提出计划办法前，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不做周密的调查研究，他所提出的政策、任务、计划办法势必脱离实际，无法贯彻，甚至给工作造成损失，中国革命中不乏这样的先例。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直至建国后，毛泽东仍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③ 陈云也多次说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④ 领导者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制定了方针、政策、任务并向下贯彻后，是否就不再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听任下级执行呢？当然不是。领导者还要深入下去，继续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因为：第一，方针、政策、任务还要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必要时还要修改、完善和补充；第二，发现好的典型，总结经验教训，推动运动发展；第三，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

①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2页。

④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35页。

为制定新政策、提出新计划做准备。总之，领导者要善于在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指导，这种具体指导，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是无法进行的。

做为被领导者在执行上级的政策、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时，也必须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而不能盲目执行。毛泽东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① 张闻天也说：“事实证明，一个任务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方法来完成。一种方法是不问实际情况的，死板的，强迫命令的，脱离群众的，违反政策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的，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执行政策的。说用前一种方法不能完成任务，是不合实际的。但是只问任务完成与否，不问任务如何完成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我们要完成任务，但只有拿后一种方法来完成，才是我们所拥护、所赞成的。不了解当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的。”^② 所以，不论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做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张闻天在亲身参加了调查研究的实践后总结说：“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③ 全面地概括了调查研究对于领导工作的重大意义。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② 《张闻天选集》，第324页。

③ 《张闻天选集》，第324—325页。

发,调查研究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

第二节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要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论是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离不开调查研究。关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调查研究的关系,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①“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③

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国国情,弄清各阶级的关系,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具体斗争策略。在苏区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做了寻乌调查,他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111页。

的办法,分地上不仅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反对了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错误作法。做了兴国调查,他弄清了贫农和雇农的问题,肯定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1931年1月,毛泽东在整理兴国调查后深刻地体会到:“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①毛泽东在深入进行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出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正确划定了农村阶级成分,分清了敌我界限,不仅1933年在苏区适用,1948年中央又印发各地,对当时的土地改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打下巩固的基础,继续大力倡导调查研究活动,使干部对日本、国民党和根据地社会情况的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仍然严重存在,许多同志还不了解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为了端正全党对于调查研究的认识,给干部指出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方法,毛泽东在1941年3月出版了《农村调查》,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跋。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2—183页。

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①“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

由于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多数对于自己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都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中央在1942年8月发布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决定》规定: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都需设立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有关材料加以研究,成为中央和各地工作的助手。《决定》号召全党、全军、政府的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要着重加强对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

《决定》还要求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的教育。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式课程,给以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与此同时,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在中央下设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均设调查研究室,成为该局委工作的助手。

《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布以后,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直属机关先后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派出了调查团。例如,西北局调查研究局派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去绥德、米脂调查,调查后写出《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调查》,于1942年冬在延安出版。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一百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战战争现状进行调查。东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中央党校也派出调查团,写出不少好的调查报告。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整理出有价值的调查材料。

在毛泽东倡导下,张闻天率领农村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1943年3月3日返回。先后在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兴县高农家、米脂县杨家沟村、绥德县西部河川地区以及双湖峪等地进行调查,整理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等报告。张闻天在1943年3月27日向中央写了报告,即《出发归来记》,汇报了一年来调查研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他说:“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①“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

^① 《张闻天选集》,第322页。

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①

毛泽东在推动全党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的同时,亲自在延安选择典型,深入调查。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做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毛泽东介绍和推广了延安县完成八万亩开荒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留守兵团和三五九旅生产建设的经验等,还表扬了优秀仓库主任何纯高、白合明。这些经验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使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能够更好地贯彻,也使生产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第三节 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也容易使调查研究流于形式,不仅不能取得有价值的材料,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贻误了工作。

调查研究首先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毛泽东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

^① 《张闻天选集》,第341页。

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毛泽东当年在湖南五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在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②

调查研究还必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详细讲了调查必须掌握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当我们观察一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象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个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现状,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全面的了解。”^①

毛泽东还强调调查研究必须抓住要点。他说:“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②

张闻天根据调查研究的体会,对于分析和综合做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调查一个农村的阶级关系,首先分解为各个家庭,再具体分析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牲畜、农具等等。人口又可以分为儿童、壮年、老年,男与女。劳动力可以分为男劳动力、女劳动力、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土地按土质分,可分为山地、川地、水地。按土地占有分,可分为自种地、租入地或租出地等。经过这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对这个农村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认识。在各个家庭调查后加以综合,从户口总数可知村的大小,从不同家庭的阶级成分可以了解全村阶级成分及阶级关系。继续进行这样的分析与综合,可以进一步了解全村土地占有关系,了解各阶级的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的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综合而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24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页。

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综合必须建立在分析之上。主观主义者的综合,并无分析作基础,他们只是从许多一般的感想中,再综合出一般的感想,这种感想当然是不能反映实际的。”^①

调查应选择好典型。《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指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后来,毛泽东曾形象地称这种典型调查的方法为“解剖麻雀。”

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多次提出开调查会,这是他亲自进行农村调查时采用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早在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谈到: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会的人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状况的人;人多人少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至少要三人;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以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他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还提出:“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②

① 《张闻天选集》,第337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

除了开调查会以外,还可以采用个别口头询问的办法,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

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这篇文章中,根据在农村调查中的亲身体会,提出十二条调查办法,主要是:一,在开始调查以前,应弄清楚调查的目的,即要调查的是什么事情,根据调查材料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二,选定调查对象后,对调查对象所处的环境应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三,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學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地向他们请教。四,同当地党、政、军、民机关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应该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不要依赖他们。五,从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着手,同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开始调查,经过他们介绍,推广到其他群众。但也不要以此束缚自己,落在少数积极分子的小圈子内。六,调查方式,可以采取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及实地调查三种,适当地把它们结合起来。七,尽量收集书面材料,如各种账簿、契约、分家单、收条、收据、家谱、碑记等。八,发现被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如阶级间的、个人间的、大姓与小姓间的、老户与外来户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九,在调查中如发现同多数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能经过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解决的,应帮助解决,以取得群众对调查者的信任与拥护。十,调查来的材料,应经常加以整理。这样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给以校正。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十一,调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当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問題还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两者相

隔太久，会使研究工作流产，因而也不能完成调查任务。十二，调查工作，不要太匆忙，以从容不迫为有利。熟悉一个地方的情形，不但需要问话，而且需要生活，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考察与体验。张闻天这些调查方法体会，对毛泽东关于调查方法的论述是必要的补充，对今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五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一节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列宁把群众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的历史哲学原理之一。他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①还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据就在这里。”^②我们党和毛泽东总结长期斗争经验所形成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系统化、具体化,使之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活动之中,形成党在一切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页。

工作中的根本路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观点。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地提出,党的任务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党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党进一步加深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领导人是周恩来。1929年,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针对第四军前委在过去忽略所在地区群众的日常斗争,存在不相信群众力量危险倾向的问题,专题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指出:“关于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起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①在讲到“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时又指出:“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对于需要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②从“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三次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已经赋予“群众路线”以“工作方式”的定义。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进一步把完成革命任务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联系起来,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9—40页。

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做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做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① 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新的经验对群众路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提炼,使群众路线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并成为党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精辟地阐明了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 1943年,毛泽东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主要标志。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样一些正确的领导方法,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强调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深刻而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③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④ 详尽地论述了为贯彻和实现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具有坚定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大会把群众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1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2页。

线的基本精神写入党章和党纲,它标志着群众路线的科学体系已日臻完善、达到成熟。

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我们党已经总结概括出了一整套群众观点,已经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而且还有了一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而科学地解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党的根本问题。这是全党同志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建党思想,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宣传、组织群众的过程中,艰苦探索,积累经验,由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等人科学总结,作出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同志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集体创造的伟大成果。

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造。对此,刘少奇作过多次解释。他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离开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路线。”^① 党的政治路线即党的总路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也要依靠群众路线。其他各种具体工作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也是这样。因此,群众路线是根本路线。我们党的这样一种认识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科学领导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说:“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2页。

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① 列宁也说：“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② 毛泽东则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 因此，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提出斗争的方向，组织人民群众自己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④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点，也是实事求是的基本点。用“实事求是”对待历史，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而“实事求是”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人类，造福人类，要达到最终目的，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和坚持群众路线是一致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意义上说，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思想觉悟程度出发，超过了群众的实际就是“左”，落后于群众的实际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第49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右。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总之,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就更好地保证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宗旨,它表现在政治路线上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最根本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把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党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通过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且团结起来,为之奋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① 他在闭幕词中再一次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党的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就在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活动才能实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只能自己救自己。毛泽东说:“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② 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③ “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靠少数人发号施令。”^①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充分地信任群众,坚决地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和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并组织和教育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并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它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路线,也是党领导和组织党员和群众工作方面所采取的路线。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相结合的路线。”^②可见,组织路线的实质就是发动、组织和团结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路线。而党的具体的组织路线,如干部路线、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都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是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所以强调群众路线是根本的组织路线,就是要将党的组织领导提高到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把群众路线贯彻到组织路线的各个方面。

毛泽东和刘少奇还特别强调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过程。党的组织路线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也就是“先当学生”的过程;在集中指导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后当先生”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是民主和集中的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合,都是以群众民主、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刘少奇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的组织路线,“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集中起来,又到党员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①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毛泽东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因而群众路线是根本的工作路线。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系统阐述了群众路线,并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根本的工作路线和根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其他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在这个方法基础上展开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是群众路线基础上的两个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就是这两个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也不是平列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后一个方法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②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领导工作中的基本矛盾,最一般的矛盾,任何时候,任何有群众的地方,都存在着这个矛盾,都要解决这个矛盾。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实际工作提出的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域中就转化为领导与被领导者的矛盾,群众路线正是保证了这个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的科学的解决,使得领导和群众、一般与个别、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起来。

毛泽东又说,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的方法,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而抓中心工作,“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

题。”^① 不难看出,各个具体方法都是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个根本的领导方法,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基本矛盾而采取的方法。群众路线之所以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就在于它规定并制约着其他一系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群众路线这个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使得党的各项具体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科学体系。

第二节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使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因为这是领导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在今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②

毛泽东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作为最基本的方法,从实践上说,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从理论上讲,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原理出发,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因而,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用更加明确的语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 以毛泽东为代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党的全部活动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不但在实践上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且在理论上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还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都必须向人民负责。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④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使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利益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它并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9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以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是一致的。

第三,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才能获得。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因此,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群众的知识、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只有经常地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吸取、集中群众的智慧,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刘少奇曾对群众观点做了经典性概括,他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①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②实践表明,有无正确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能否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是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前提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群众观点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把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历史作用的原理,用于指导伟大的抗日战争。抗战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只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观点,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以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1938年5月,他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①当时,在日本侵略者的优势装备面前,一些人,特别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头子们,只看到日本侵略者武器优良和中国军队武器的低劣,看不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因而认为中国一定要失败。毛泽东批判了这种“唯武器论”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民的作用。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事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②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就造成了抵御敌人的铜墙铁壁和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赢得战争胜利的前提。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依靠群众进行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动员了广大群众投入战争,母送子、妻送郎,积极参军参战,大力支援抗战,并创造了地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5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形式，浴血奋战八年，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把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观点运用于对党的全部工作的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在武装斗争上，制定了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解决了人民与军队、人民与战争、人与武器、士兵与指挥员的关系；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使党始终保持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使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统一战线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建立广泛的革命联盟；在文化艺术工作上，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所作的几次重要报告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详尽地阐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肯定人民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并不否认领导者在革命中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承认杰出人物、伟大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他们对于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指明斗争的方向并站在斗争前列带领人民群众前进，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指出，一个单位必须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完成革命的各项任务。又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1937年他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要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①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其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由群众斗争所锻炼和筛选的。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比群众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善于洞察全局，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向，提出历史的任务和目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策略。他们又是群众的组织者，用先进的思想、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伟大的组织力量，教育群众正确地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领导群众去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

领导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革命事业的胜利固然离不开正确的领导，但是他们能够起重大作用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天生本事大，而是因为反映了群众的要求，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否则其作用是渺小的。毛泽东强调：“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②离开了群众，再高明的领导也会一事无成。这是因为，领导的正确意见、方针、政策，来自群众，是在“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中形成的；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页。

导的正确意见、方针、政策,又必须为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实现,才能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如何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呢?毛泽东等对此也有大量论述。第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第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种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 同时又指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这个基本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第三,领导者既要分工又要统一。领导者分工而又统一,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所谓统一,就是指集体领导。刘少奇说:“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② 领导机关只有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只有通过集体讨论,集思广益,依靠集体的经验和智慧,才能做出正确决定,防止个人专断和个人包办。同样,领导成员必须有明确的分工,从而使各个领导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只有领导分工而无统一,工作就会出现冷冷清清,少数人在干的状态;如果只有领导统一而无领导分工,工作就会出现无人负责的状态。只有把领导分工和统一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第四,团结积极分子,提高中间分子,争取后进分子。毛泽东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③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一批由积极分子组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的骨干力量。积极分子觉悟早,自觉程度高,把他们团结起来,就有了发动群众的骨干。领导要善于团结积极分子,依靠他们的模范行动和桥梁作用,去提高中间状态的群众,进而影响和争取落后的群众,这才能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发动起来,也才能经常地具体地使领导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节 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1946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①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党的领导方法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科学地解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正确地实现党的领导。

为什么说正确的领导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呢?这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而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

众的领导力量 and 核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的宗旨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离开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同时，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不能实现，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一个也不行。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善于集中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主体，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地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①所有的领导干部，每到一地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热情关心群众的疾苦，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考察群众的需要，悉心了解群众的觉悟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开展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否则，关起门来去出主意、想办法、制定政策，那么，这种主意、办法、政策只能是主观主义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

毛泽东讲的集中起来，当然不是说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简单地堆积起来，而是要经过选择、整理和概括。因为群众的意见一般是分散的。由于觉悟程度的不同，他们的意见有的是正确、合理的，也有的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就是合理的意见，也不一定就具有指导全局的意义。因此，这个集中，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科学地分析综合，把合理的带有全局性的意见归纳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和办法。这种“从群众中来”的意见和办法，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

经不是原来的那种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了,而是经过“加工”的科学意见和办法。

“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的过程,就是把集中了的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再放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①毛泽东历来主张,凡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要靠大家来办,靠人民群众来办,要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来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虽然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但还是要人民群众自己去实现。只有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等最迅速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只有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应当怎样做,事情才可以办好。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的错误观点。因为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因此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使广大群众都能懂得和都能掌握政策。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行之有效的方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之所以行之有效,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这个方法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党的领导方法上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其基础、核心就是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主要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离开群众的实践去讲实践,实践就成了一个单调的空洞的概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依赖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所以,认识依赖于实践,就是依赖于群众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践；认识为实践服务，就是为群众的实践服务。这样，从认识论上来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群众路线的科学领导方法上来看，就是群众、领导、再群众、再领导。这两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虽然二者不能机械地划等号，其中有一定的差别，但它们在我们党的领导工作中往往是溶为一体，不可分割的。

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与认识论的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一致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的认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离开从群众中来，领导者的认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领导机关和领导者，要使自己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方案、办法等符合客观实际，不能靠自己闭门造车，也不能仅靠个人或几个人的实践经验，而要集中群众的实践经验。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科学的领导意见。也就是通过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摸清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有事同群众商量，以形成切合实际的正确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当然，从总体上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是丰富的、全面的和接近客观实际的。但就群众中每个成员的意见来说，由于人们在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社会经历、文化水平、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不同，因而他们的意见或认识也就不尽相同。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即有分散的、无系统的、片面的，也有较为集中、系统、全面的，等等。因此，就需要领导者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掌握全面的和真实的材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已经取得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使之上升为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保留和发展了群众的正确认识，修正了群众认识中片面的东西，抛弃了错误的东西。然后根据这种认识制定出合乎民意、顺应民情、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来。

可见,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不是把群众的诸多认识简单地堆积和相加的过程,而是经过领导者起一个“加工厂”或“加工者”的作用,把“原料”、“半成品”(即群众的意见)进行科学加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与认识论的理论认识指导实践并由实践来检验的过程一致的。到群众中去,就是把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化为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也就是把吸取群众意见而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思想 and 自觉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去改造世界。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形成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等等,再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使之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领导群众前进的过程,也是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这时候,思想就转化为行动,认识就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同时,判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办法是否正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拿到人民群众中去用实践检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中,正确的东西将会获得成功,从而得到发扬、完善、发展,错误的东西就会受到挫折而归于失败。可见,到群众中去,既是实行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的过程,又是检验和进一步完善、发展、修正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的过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与认识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过程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复杂的和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反复的和无限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 而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 可见,毛泽东把认识的不断反复过程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反复过程实质上看成是一个过程,只不过表述的角度不同罢了。一个是从人的认识过程的角度,一个是领导走群众路线过程的角度。的确,如同认识需要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样,任何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的形成和实施,也不可能只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个具体过程就能完成,而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且,客观事物和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不断地出现,因而领导者的认识和领导机关制定的方针、政策等,也在不断地提高、完善和发展,是不断地走群众路线,不断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形成正确的意见,以指导行动。总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過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生命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在于它是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反复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不仅系统阐述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原理化为实际的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独创性贡献。

第四节 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对领导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毛泽东在1944年总结了我们党24年的历史经验,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应,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① 他特别批评了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命令主义的错误,主要是违背群众自愿的原则,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不问群众的意见如何,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而是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来对待群众。例如,党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就犯了这种错误。他们强迫群众罢工、起义和夺取大城市,“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主义。”^①有些时候,虽然群众在客观上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这种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说服、教育,使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下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了,我们才能去实行这种改革。而命令主义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管群众是否愿意,更不去做这种启发群众觉悟的工作,只是硬性地命令群众去实行这种改革,因而也就脱离了群众,甚至犯了错误。命令主义违背群众的自愿原则,脱离群众,必然做不好工作。毛泽东说:“群众心齐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②群众力量的巨大就在于群众的齐心努力,而齐心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不自愿就不会齐心。比如打仗,不光指挥员要齐心,还要战士齐心。共产党就是通过让部队诉苦整训,使广大指战员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怎么个打法,因而上下齐心,全军齐心,个个士气很高,磨拳擦掌,当然也就能够打胜仗。要让群众齐心,就要让群众知道真理,认识共同目的。反之,“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③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命令主义,主张在一切工作中要善于启发群众的觉悟,依靠群众的自觉行动。“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④

尾巴主义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毛泽东在批评尾巴主义时说:“许多时候,广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页。

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① 尾巴主义看起来很相信群众,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觉悟程度,迁就群众中的落后意见,并将这种意见误认为是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他们不是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群众,而是跟在群众后面拖群众的后腿。犯右倾错误的人,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毛病,往往出在这里。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②

要克服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调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就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仍然坚持了为群众谋长远的根本利益与为群众谋眼前的现实利益相统一的原则。1941—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减少了,军队和干部减员了,粮食紧张,财政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片面地强调要施“仁政”,毛泽东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但是,另一方面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些同志又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甚至对群众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对这种思想和做法,毛泽东也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①当时,有些同志只知向人民要粮、要草、要税,动员群众,而不知道尽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毛泽东指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去解决这些问题。”^②我们只有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如不送出粮草等东西给政府,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顺利,才会感到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毛泽东把这称为“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③

①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第35页。

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第35—36页。

③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第36页。

下面是能说明这个根本路线、根本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开征粮会议，天降大雨，雷电交加，打死了参加会议的一个县长，于是便有人说怪话，说雷公为何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讲这话的人。毛泽东知道后不让追查，而是从这件事引起了警觉，检查党做了什么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情，引起了老百姓不满。原来，陕北这个134万人口的地方，每年要征收19万担公粮，老百姓负担太重，引起了不满。毛泽东提出不能再这样做了。建议边区政府将征粮减为16万担，同时在机关和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老百姓一起共度难关，从而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1943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积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①后来邓小平谈到这件事时也说：“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

政策。”^①

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还必须照顾到同盟者的利益(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这是因为任何一个阶级对革命采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都是从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的。所以,为了把社会上多数阶级吸引到革命一边,就不能不照顾到这些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例如,对待民族工商业,一方面保护、鼓励他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性,使他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不使私人资本垄断国民经济和过分地剥削劳动者。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人员曾经采取了三三制,即大约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占三分之一。农民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这样最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也必须照顾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帮助他们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使他们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减轻他们的负担,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

总之,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党制定了正确政策,从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了他们抗日的积极性。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42—43页。

第六章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第一节 一切工作必须应用的基本方法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是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来的一个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该决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接着，毛泽东具体地阐释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应有内涵：“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毛泽东紧接着又结合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情况，说明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他强调指出：“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了将一般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页。

号召与个别指导相分离的错误倾向或作法。他指出：“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①

另外，毛泽东还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分析论证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关系。他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做而得到的。”^②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对立统一，因此，只有使二者密切结合，才能显示出这一方法的实际意义。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哲学角度论证了一般与个别的不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9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

分性。他说,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共性是绝对性,然而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是一个辩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完整的论述。他说:“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这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再从个别到一般,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从哲学角度论证了这种运动过程的必然性。他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必须以群众路线为前提,即是说,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形成一般号召,只有再到群众中去,对群众进行个别指导,一般号召才能得到检验、修正或补充,也才能形成新的一般号召。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认为,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只是群众路线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号召从群众中来,从个别指导中来,具体化为实践所需要的形式,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它才能发挥出重要作用;个别指导是一般号召的基础,离开了个别指导,一般号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有落空的危险,但只有当它接受了一般号召的指导时,它才是明确的,有效的。

第二节 一般号召的形成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讲的一般号召既指“一般意见”,又指一种总的计划,如他举例说的 1943 年整风中,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提出的全年整风计划,而在其他的著作或文章中,还有其他多种涵义。总之,可把“一般号召”理解为一种带相对的总括性、根本性、普遍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指导性的观念性的东西。例如,

1. 它有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一再强调,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2. 它有时是指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

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坚持团结对敌的总方针。

3. 它有时是指一种根本宗旨或政治目的。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其实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在《论持久战》中,他还指出:“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要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

4. 它有时是指一种战略计划或部署。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又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自倡导和领导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以及

以陕甘宁边区为首,在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

5. 它有时是指一种一般的原则、纲领、政策、方针、计划。如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三个基本原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还指出:对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又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一般方针,还不是具体方针。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在实现预想目的,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一般号召有着重要作用。一般是从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本质,是共性,因此它对同类事物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见。一般号召,可以使领导的意见、方针、政策能迅速地直接地与广大群众见面,可以广泛地普遍地动员群众行动起来。没有一般号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群众就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一致的行动步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条件之一。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他进一步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这里所说的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一般号召要发挥作用,必须带上具体的形式,也就是要变成具体的方针、政策、策略、方式、方法,否则,一般号召仍有落空的危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单单说明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另外,毛泽东还反复说明了抗日战争不仅需要一般方针的指导,不仅要有战略计划或部署,而且需要制定具体方针,要有战术的方法或策略。否则,一般方针,战略计划

或部署等就有落空的危险。

一般号召是怎么形成的呢？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这时候，形成一般号召的任务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鉴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教训，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作了完整的科学分析和论述。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就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共性就存在于矛盾的个性之中。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然后再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因此，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就要求领导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在许多单位的个别指导中，从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各个特殊的意见中，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形成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意见（一般号召），而后，就是再拿这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去进行个别指导。因此，一般号召是从个别指导中得来或形成的。也就是说，“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结合军事计划的制定情况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一般的意见、计划或号召只能从对个别的调查研究中来，否则，这种一般的东西就是靠不住的。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第三节 突破一点,推动全盘

任何一般号召都是针对一类事物或情况而言,并普遍适用于一类事物或情况中的任何个别事情或情况的。但任何一般号召在形成之后,在没有得到检验之前,为减小损失,最好的办法是先进进行选点试验,然后再由点到面地铺开。事实上,即使是正确的一般号召,要发挥其作用,也不是齐头并进,瞬间完成的,它总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由部分到全体地得以实现。另外,一般号召的制定与执行是不同的,为贯彻执行的顺利,也最好是先局部地进行实施,取得经验,在此基础上,再普遍地全面推行。这样一个环节,也就是毛泽东讲的“个别指导”。也就是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论述的:在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做出之后,领导人员应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像1943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都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

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做。

个别指导的环节主要有三个：一是选取典型；二是检查一般号召在典型单位的执行情况；三是总结经验并形成新的一般号召。

个别指导的第一步是选取典型。所谓典型是指一类事物中能够表现和说明一类事物本质特征、发展趋势或发展规律的个别事物。典型的经验应具有普遍性、同类性和超前性。典型或表现为有代表性的个别单位，或表现为有代表性的个人。选取典型应与一般号召的要求相一致，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防止以个人好恶随意去挑选典型。同时要考虑落实一般号召的多种需要。例如要选择分别处于先进、中间、落后不同状态中的典型；选择分别处于优越、一般、恶劣不同客观条件下的典型；选择大、中、小不同发展规模的典型等等。

个别指导的第二步是检查了解一般号召在典型单位的执行情况。也就像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举例讲的：在整风计划下达之后，选择二三个单位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等等。调查了解一般号召在典型单位的执行情况，一定要注意其全面性，全面地占有各方面的材料，既要了解执行一般号召之前是一种什么情况，又要了解执行一般号召之后是一种什么情况；既要了解、把握现状，又要了解把握执行一般号召的发展变化过程；既要了解由于执行一般号召而引起的积极变化，也要了解由于执行一般号召而引起的消极变化；既要了解执行一般号召的人员队伍情况，又要了解执行一般号召的方法、手段，等等等等，总之，调查了解典型单位的情况一定要全面。

其次，检查、了解典型单位的情况一定要客观，是什么就是什

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一是一,二是二,不允许有半点虚假。

再次,检查、了解典型单位的情况一定要认真、细致。对此,毛泽东在1941年所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把检查工作做为领导者的一项任务,指出:“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缺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缺点。”^① 在检查工作中,发现原来配备的干部不恰当,就及时调换;发现执行机关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就及时地改造这个机关或者设法纠正其错误态度;发现原订的计划和指示本身有缺点,就及时地修改或补充,使之成为可以实现的切合实际的计划和指示。

关于检查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任弼时提出:“第一,我们审查一件工作,不能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它的实际结果。第二,我们在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不应当是仅仅从上而下的,仅仅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审查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审查。比如我们审查一个工厂的工作情形,不仅派人去审查这个工厂的管理机关的工作,和经过管理机关去进行审查,并且要发动这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由下而上地审查它的业务计划进行的实际情况,审查工厂管理机关的领导工作。只有采取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配合的审查方法,才能使我们对于工作执行的实际情况了解无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1页。

遗,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①

个别指导的第三步是总结经验并形成新的一般号召。了解调查典型的情况,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推动一般号召的普遍落实。所谓总结经验,就是指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对一般号召在典型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看哪些方面达到了要求,哪些方面没有达到要求?没达到要求的原因是什么?是一般号召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本身的问题?又应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就是总结的大致内容。通过总结,可以完善原来的一般号召,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一般号召。

无论何种一般号召作出之后,在普遍推行之前,都必须经过个别指导。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所有重大政策或部署都是这样做的。正如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的:“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②

1941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遭到了极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1942年又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切实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为把大生产运动切实开展起来,中央领导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部队首先行动起来,率先垂范,积累经验,影响他人。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在延安的杨家岭开荒

① 《任弼时选集》,第2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种地，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朱德除了给部队勘察土地，规定任务，督促检查，还亲自开荒种地，为解放区军民作出榜样。著名的“南泥湾精神”更是为人称颂：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 359 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于 1941 年 3 月开进延安县金盆区南泥湾开荒生产，经过全旅指战员三年的艰苦奋战，先后开荒 26 万亩，并养牛喂羊，自办工厂，使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富饶的陕北小“江南”。不仅做到了吃穿用全部自给，还上交公粮 500 万斤。“南泥湾精神”由此成为全军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为边区人民树立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榜样。

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能够搞生产，已不成问题。在游击区，在敌后的敌后，能不能搞生产？毛泽东根据报纸上的一篇报道撰文指出：《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晋察冀的事实证明可以。对于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农业生产可以，手工业生产和其他生产行不行？游击战斗频繁，军队从事生产会不会影响作战，晋察冀的事实都做了明确的回答。游击区群众能不能发展生产运动？有的地方没搞减租或者减租不彻底，农民是否有兴趣参加生产，也做了回答。

最后，毛泽东还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而且是经济的竞赛。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从事经济工作，必须在今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

在开展干部教育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结合和个别指导的作用。为把学习推向深入，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总结学习经验，然后推广到全党。对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毛泽东经常亲自指导，为学习组制定学习计划，选定学习材料，检查学习进展情况，总结经验，然后向全党作出指示。另外，毛泽东还常到当时的抗大和中央党校，做动员，听汇报，指导工作。

毛泽东 1941 年 8 月 22 日写给谢觉哉(当时任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信中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做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富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①

毛泽东在 1942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介绍了延安县、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富县城关区、三五九旅等经验。他高度评价了延安县党政领导同志的工作,推广延安县关于开荒、难民参加生产、动员二流子生产的经验。他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这种精神,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想像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做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么!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6—187 页。

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①

关于延安南区合作社,毛泽东认为:“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纽带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他还主张由边区建设厅调查研究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写成小册子,作为各县政府第四科及各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教材;并利用在延安开会的机会,引导边区各地工作干部去参观南区合作社。

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地区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运动的进程,及时地、迅速地加以具体指导。毛泽东在看到山西崞县的土地改革经验后,立即要求广播和登报,“时间愈快愈好”。他在批示中指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致重犯。”^② 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第767—768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45—146页。

党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中央、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直到支部，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小型会议（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谈话等项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例如三至五个人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不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做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这种报告和指示，往往过时，失去作用，或者减少了作用。犯错误的已经犯过，来不及纠正，损失太大。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① 这个指示不仅对工作任务、不同地区的不同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还对开好干部会议和加强对运动的指导指出了具体方法，推动了工作的开展。

在一般号召作出之后，必须进行个别指导，这是对领导工作的一种普遍性要求。延安时期，不仅毛泽东特别重视它，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此也非常重视。例如，刘少奇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我们要真正从一个村一个乡开始，了解清楚，着手工作。如果真正了解七八个村，解决了七八个村的问题，那么农村妇女运动究竟如何搞好，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再把这种经验普遍推行，就可能形成一个运动，使整个运动提高一步。这就是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自然，在突破一点以后，即在少数地方取得具体经验以后，就必须善于使这种经验普遍化，使之推动全局，形成运动，解决问题，不能老是去‘突破一点’。”^② 陈云在1940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9页。

12月23日所作的《学会领导方法》一文中也指出：“兜底查。检查支部和乡的工作，要抓住一两个典型，总结出经验，教育其他。”^①

周恩来亲自处理的一件工作可以表明他是善于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的典范。1947年5月，周恩来在陕北战场上经过安塞县了解到贯彻西北局扩军决定中的问题，发现对七区扩军未经调查就确定为170人，时间又仓促，规定一周完成扩军数目，两周听候集中，很可能形成五抽二、三抽一的“派兵”。周恩来认为做好扩军工作，要了解情况，弄通思想，解决问题，走群众路线。他于5月30日致函西北局领导林伯渠、马明方等，指出：“西北局关于扩军的决定，已收到。改得很好，其规定的动员步骤，也很合实际需要。目前问题，就在如何使这个决定能成为实际工作中的指南，这就要靠很强的组织工作了。”^②在谈了安塞七区扩军情况后，具体提议：一，西北局应一方面电告延安地委纠正这一办法，一方面派人或约集延安地委来人至西北局谈通这一扩军的办法。二，延安地委必须按照西北局决定的方针与指示，确定自己的切实动员办法，尤其要先从地委一级动员起，造成干部带头的空气与作风。三，各县应有数目规定，但首先应动员县级干部，弄通思想，改变作风，然后再至各区深入讨论，至各乡切实调查，定出切乎实际的动员办法，挨乡挨户去宣传，从实际的了解中再修正自己的办法，务必做到群众懂得扩军参战的重要，并与其解决土地与生产问题联系起来，与解决抗属困难及改造党的问题联系起来。四，有了切实的动员与实际情况的了解，然后再回到区委讨论，定出大致的分配数目与组织游击队及直接到正规军的办法。这里特别需要干部带头，党

①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第154页。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92页。

员模范,然后再经各乡发动自动报名,召开群众大会,逐步完成自愿扩军的任务。五,在动员中,如需先解决土地斗争或生产问题,即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联系到扩军或打下扩军基础,第二步再行扩军。六,依上述步骤,也许第一月只能做到地委、县、区的动员,或开始进行乡村的调查与宣传。如到第二月,进行调查与宣传,又联系到土地斗争与生产时,则实行自动报名不妨推迟至第三月。自然在敌占区附近,动员的步骤和时间,不必这样长,参加游击队也许需要更快些,但方法仍是要从了解情况做起。周恩来最后说:“以上所说的,只能做提议看。你们还应根据更多的更实际的情况考虑,并在讨论决定后告知我们。”^①

第四节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是指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方法和作风。实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表现为: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表面化和绝对化,哗众取宠,不求实效,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照抄照搬,搞“本本主义”;不倾听群众意见,不根据实际情况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只求收发无误;只满足于一般号召或者发号施令,不注重深入实际,进行个别指导。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曾多次对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96页。

形式主义妨碍了党的策略路线在群众中深入贯彻执行,是对上级的怠工。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是无法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真正结合起来的。当时在文教工作方面的形式主义主要是:有些同志求成心太切,任务一经提出,恨不得马上成功。热情是好的,但是缺乏实际的计算,于是采取简单命令的办法布置下去。将领导上成熟了的東西,当做下级干部和群众已经成熟了,不加解释说服,不愿等待,因而下级干部和群众接受不了,瞞上不瞞下,数字很多,内容很少。命令主义产生了形式主义,好心引起了坏结果。在部队的政治工作方面,也有形式主义的毛病,例如:工作计划随时可用、随地可用,习惯于老一套公式,不知随情况变化而变化;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完成“学习计划”,学的人把听课当成负担;上级规定许多表格要求下级填,下级拼命填,内容却千篇一律,很少适用,徒费精力,上级又不加分析整理,化为废纸;机关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于琐碎形式,真正领导工作反而少了;连队有的组织,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等等。这些形式主义的毛病,经过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和1944年4月的西北局高干会,基本上得到了克服和纠正。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政治病症,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不高,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成分的存在,常常容易接受剥削阶级的影响,产生官僚主义作风。其主要表现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例如,有的人是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随意发号施令,误国误民;有的人是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强迫命令,胡乱指挥;有的人是忙忙碌碌,盲目单干,不研究政策,不依靠群众,工作无计划,办事无方向;还有的人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想个人利益,不为群众办事,等等。总之,共产党员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就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早在1933年苏区时期就严厉批评过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认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方式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的方式。”^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批评官僚主义是沾染了国民党作风。他说:“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救民积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②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指出了官僚主义的特点。他说:“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934页。

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只有清除官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有的官僚主义者实际无知,架子十足,不调查,不研究,贪便宜怕苦干,爱好形式,轻视内容,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这样,官僚主义就和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更顽固的病症。必须提倡科学的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①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7页。

第七章 抓紧中心工作

第一节 主要矛盾理论的具体应用

抓紧中心工作,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而提出的一条重要的科学领导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地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进而,他对领导者和领导机关提出了具体要求:“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

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①

关于抓紧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1949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这样表述：“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②

毛泽东关于抓紧中心工作领导方法的论述，还散见在他的其它论著或篇章中。毛泽东这一领导方法的要点是：（1）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里，必须确立一个工作中心；（2）围绕着中心工作，辅以第二位、第三位等其它工作；（3）从实际出发，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4）要抓紧中心工作，坚持贯彻到底，务求成效。

毛泽东关于抓紧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灵活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抓紧中心工作，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哲学范畴即抓住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主要矛盾问题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指导实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强调，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列宁指出,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马克思虽然没有这样的语言表述,但是他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时,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根本矛盾制约,这一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但是他们的一些论述,特别是他们在具体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却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所以,毛泽东说,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也是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苏联过渡时期经济时告诉我们的方法。然而将这一方法作出哲学的概括和升华,并正确地转化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指导,则是毛泽东的一个贡献。

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写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矛盾论》,其中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然而,“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②毛泽东不仅强调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而且指出对于非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要矛盾也不可忽略,要认识主次矛盾的相互转化。他认为: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而且矛盾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或基本上解决了,出现了新的主要矛盾;另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虽未解决,但由于条件的变化而降为次要矛盾,其他某个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两种情况都使得事物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因此,从方法论上说,就要求革命党人必须随着过程和阶段的推移及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地转移自己的工作重心或斗争的主攻方向。

毛泽东不仅从哲学的角度全面地深刻地阐述了主要矛盾问题,而且把这一哲学原理巧妙地具体地转化为一种领导方法。将抓住主要矛盾转化为抓住中心工作,将主次矛盾相互作用转化为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把哲学原理灵活地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抓紧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就是他的《矛盾论》中分析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矛盾原理是抓紧中心工作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抓住了主要矛盾即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全局,实现抓紧中心工作的这一领导方法的意义也就十分明确了。

第二节 统筹全局,决定工作中心

工作必须有中心,怎样才能正确地确立这个中心呢?毛泽东告

诉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① 以此为指导，正确地决定工作中心就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全面的、本质的、发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确定的工作中心，才能够起到影响、规定、带动全局工作的作用。

首先，确定工作中心要认识和掌握“中心”的特性，毛泽东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② 他还指出，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那便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中心工作的主要特性是：(1)从作用上看，“中心”在全盘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对整个工作的开展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从数量上看，“中心”只有一个，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而不能同时有多个中心工作，多中心实质上就是无中心。(3)从发展上看，“中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矛盾总体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心，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它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从而推动着工作的不断发展。(4)从层次上看,“中心”具有多层次性,就是说,从整个国家到具体部门的各个级层,在一定时期里也有它们各自的“中心”。各个层次的“中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说,高层次的“中心”统率着低层次的“中心”,低层次的“中心”制约着高层次的“中心”。但是,低层次“中心”的解决,又不等于高层次“中心”的解决。认识和掌握了中心工作的这些特殊点,就为我们正确地决定中心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

其次,确定工作中心要把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心工作是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问题,与一般具体事物或具体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和较强的抽象性。因此,确定中心工作必须要高瞻远瞩,统筹全局,要有革命的胆略。然而,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是在坚持客观性的基础上,也可以说首先要有求实精神。没有求实精神,不可能抓准抓住全局性战略性的中心工作;没有革命胆略,难于运筹帷幄,把握主动。为此,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提倡学习列宁的工作作风,这就是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

确定中心工作必须坚持客观性,要求实务实。抓住工作中心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又必须依据客观实际来确定这个中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因而矛盾和矛盾双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也必有主次之分。我们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因为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抓住了主要的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或者说,其他次要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抓住主要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正是基于对抓主要矛盾问题的客观分析,毛泽东在领导方法上则提出抓住中心工作,也就是抓住能够影响和带动全局的工作。他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① 必须抓住中心工作,这是带动全局推进事业的客观要求。然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依据客观实际来确定这个中心,也就是确定工作中心要坚持客观性。只有这样来确定的工作中心,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才能够有效地推动事物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②

确定工作中心要坚持客观性,概括地说,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反对主观性。对此,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他在1941年5月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有着这样一段集中的表述:“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 这也就告诉我们,确定工作中心坚持客观性还可以具体为,一方面要客观地观察事物,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观察事物,要从客观事物内部固有的内部联系去观察事物,而不是从主观愿望、主观想象或死的书本出发去观察事物;另一方面要认识客观规律,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要从分析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而不能靠一时热情,按主观随意性,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事物。坚持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正确决定中心工作的基本条件。

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正确地选择革命道路和工作中心,既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考虑革命需要,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两者缺一不可。这不仅为毛泽东所提倡,而且为他所力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识到:这时在国际和国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国际上,第一种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妄图灭亡中国,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第二种力量是斯大林主义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他们是中国抗战的支持者和朋友。第三种力量是英美帝国主义。它们对中国的抗战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抗战,以便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国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发展起来,企图利用日本消灭中国革命,或者希望中日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在国内,第一种力量是汉奸,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日本为“以华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华”而收买的爪牙和走狗。第二种力量是人民。其中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抗战最坚决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全国抗日力量的领导者及核心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也站在抗战方面。第三种力量是国民党。它对抗战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日本的侵略直接侵犯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英美在华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抗日。另一方面它又害怕和仇视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反对人民起来抗战，甚至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日军消灭共产党。抱着既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又扼杀共产党的幻想，对日妥协投降。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实际出发，客观冷静地分析当时的各种形势，才能够在诸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中日矛盾；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大无畏的革命胆识，才敢于在国民党为执政党，它对抗战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的情况下，果断、正确地确立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的中心工作，建立起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报告中对此作过详尽论述。他指出，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1927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这就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中日矛盾也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

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中国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血腥的侵略,中国内部的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在这一时期,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中心任务。

再次,确定工作中心要注意层次性,对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十分明确,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但是,由于工作范围和工作任务不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有它的中心,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也有它们各自的中心,而这些众多的小中心又都必须围绕着、服务于大中心,这就形成了整体中心工作的层次性。

毛泽东指出:领导人员要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他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如果象教条主义者那样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是不可能正确地解决矛盾的。因为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矛盾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特殊的,千差万别的。所以,一个实际部门中心工作的确立必须兼顾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和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两个方面。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但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因而具体的中心工作也有所不同。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日寇的

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1941年8月22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①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②因此,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经济和教育成为大多数人的中心工作,第一位的工作。边区的党、政府、人民做好了经济工作,就是极大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他还批评了轻视经济工作而空谈抗日与革命的错误倾向。由此可见,围绕着全国的中心工作,不同的地区、部门和单位都有自己的中心工作,这些局部的不同层次的中心工作是全国的总的中心工作的具体化,而且必须服从、服务于全国的总的中心工作。一般地说,总的中心工作主导着局部的中心工作,局部的中心工作反过来又制约着总的中心工作。

第三节 突出重点,带动一般

正确地决定了工作中心,就是抓准了中心环节,就能把握住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整个链条”，统筹全局，并以此带动其他工作，做到“纲举目张”。这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和放松其他工作？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作了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他指出，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形成一种工作秩序，就好象弹钢琴，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这就说出了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的辩证关系，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抓紧中心工作领导方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和大量实践中，概括出这样几个要点：一是必须突出中心，坚持重点论，抓紧中心工作，反对平均主义；二是既要突出中心，又要兼顾一般，坚持两点论，注意协调性，反对把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对立起来；三是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要有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反对一成不变的静止的观点；四是抓住中心可以带动一般，但这种带动并不是可以不要任何条件就自然地变为现实，要实现这种带动还要有意识地创造必要的条件，反对自发论。

首先，抓紧中心工作必须突出中心，坚持重点论，反对平均主义，同时又必须抓紧抓实，务求成效。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地提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具体的条件下坚持一个中心，坚持重点论，就是要使工作的中心成为力量的重心，就是为了集中力量抓好中心，抓出成效。否则，就会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地区同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以致得不到确定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强调，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抓住中心工作就是要突出重点,但是强调突出的同时,还必须配之以抓紧抓实,否则突出重点就成了摆出重点。毛泽东在《党委的工作方法》中指出:“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象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① 陈云也指出过,必须抓住中心工作,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这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1942年毛泽东亲自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是集中力量抓紧中心工作领导方法正确运用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了两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说:“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② 他把这两大运动形象地比喻为整个革命链条上的“两个环子”。毛泽东领导全党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环子,“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们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③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与此同时,又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切断了外面对边区的一切援助。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保证党在全国的中心任务的完成,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3页。

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次生产运动是从上到下、从军到民总动员，领导不仅亲自参加建设，而且对建设的领导扎扎实实，一抓到底。因而，生产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一个地区一定的时间内，确立一个中心工作，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抓紧抓实抓到底，这是抓紧中心工作领导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正确处理中心和一般的关系，就必须坚持两点论，既要突出中心，又要兼顾一般，反对把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对立起来。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时，强调了要抓主要矛盾，但这并不是可以忽略非主要矛盾的作用，或者等到主要矛盾解决了以后才去解决其他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虽然地位不同，但它们是互为前提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实践经验也表明，适时地恰当地解决非主要矛盾是必要的，这不但不妨碍抓主要矛盾，反而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的关系亦是如此。中心是对一般而言，没有一般也就无所谓中心。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曾深刻分析并正确处理革命战争同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树立了典范。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演讲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本身的重要性及它与中心工作革命战争的关系作了科学的阐释，他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

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① 但是,毛泽东并不因革命战争是中心工作而不主张抓好经济工作,相反,他认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如果认为革命战争是中心,而不去抓经济工作,甚至把搞经济工作骂为“右倾”,那是极端错误的。他批评有些人口头上说一切服从战争,却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扩大红军,打败敌人。他还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②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③ 实践也作出了有力的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致力于革命战争的同时,努力注意解决好一切有利于和服从于革命战争的工作,因而能够率领中国人民胜利的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着各自的位置和各自不可取代的作用,不能随意变换,也不能截然对立,要在坚持一个中心的同时,围绕中心工作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克服在这一领导方法问题上的片面观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页。

再次,正确处理中心和一般的关系,还必须注意主次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树立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变化中,一成不变的事物不存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谈到矛盾的转化问题时,指出:矛盾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或基本上解决了,出现了新的主要矛盾;另一种情况是,原来的主要矛盾虽未解决,但由于条件的变化而下降为次要矛盾的地位,其他某个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的矛盾。这两种情况都使得事物发展过程显现出阶段性来。因此,从方法论上说,就要求革命党人必须随着过程和阶段的推移及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转移自己的工作重点或斗争的主攻方向。他还引用了中外革命史上大量事例论证和说明矛盾相互转化的情形,进而具体地揭示了事物新陈代谢不断发展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及主次矛盾互相转化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科学分析,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① 待到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又及时指出:生产建设是城市工作的中心,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心工作服务的”^①，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主次矛盾又发生过多次转化，因此每一具体时期的革命中心任务又有所不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英、美、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后来，在北伐胜利进军途中，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又变成了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力量同投靠帝国主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矛盾。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的侵略战争，妄图变我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则降为次要矛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抢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并把内战强加在人民头上。于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了。在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由于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心工作必须随之改变。即使在同一个大的阶段中，由于矛盾的微妙转化，具体的中心任务也必须有所变化。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抗日，但在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的不同阶段，具体的中心工作又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发展的观点，高瞻远瞩，既着眼于现在，又放眼未来，只有这样，才能通观全局，把握住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才能够抓好中心工作。

最后，正确处理中心和一般的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要牢牢地抓住中心，以带动一般，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为实现这种带动创造必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的条件。

毛泽东在论述抓紧中心工作这一领导方法上,强调了捉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主要是因为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心工作,即抓住了事物的全局和本质,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对于次要矛盾、一般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具有推进和带动的作用。然而,中心对一般的这种推进和带动作用,只是从可能的意义上来讲的,并不是说这种带动可以不要任何条件就自然地变为现实。抓住了中心不等于就实现了带动一般。

要把抓住中心带动一般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则需要领导者进行一系列深入的思考和艰苦的工作。至少需要做到:一要努力从各个方面发挥中心工作对一般工作的推动作用;二要在完成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努力为其它任务的解决开辟道路;三要善于运用中心工作的实践经验指导其它一般工作的健康发展。在完成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努力为其它任务的解决开辟道路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然而,毛泽东没有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而是高瞻远瞩,用轰轰烈烈的农村斗争影响和推动城市的斗争,无论是在物资上还是在人员上都为城市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而言之,毛泽东关于抓紧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从基本理论到社会实践,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主要矛盾,这是领导者能否作出科学决策的基础,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全局性问题。它不仅是保证我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斗争环节,而且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避免发生右和“左”的错误的根本方法。正因为毛泽东坚持面向实

际的原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方面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因而方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全力捉住居于主要地位、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引导人们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的中心环节,去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抓紧中心工作领导方法的正确运用为我们事业的成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相反,它的错误运用也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十分巨大的损失。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的新变化,郑重地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情况之间的矛盾,适时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把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可是,从八届三中全会起,却在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越来越对我国现实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直至酿成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反而一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把本来已经退居为次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说成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给我们造成了历史性的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生活陷入严重混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

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果断地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正是基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数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科学分析而作出的英明抉择,也

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抓主要矛盾领导方法的成功运用。邓小平继承和发挥了毛泽东抓紧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他强调工作重点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他在分析和把握重点时，坚持不同范围有不同的重点，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主张工作的重点必须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的领导实践还向我们提出，抓紧中心工作不仅要集中全力于中心，而且要提供充分的保证和条件，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制定就是一个生动的范例。这是对毛泽东抓紧中心工作领导方法的一个发展。

第八章 掌握政策

第一节 正确制定政策

毛泽东在 60 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十分注重政策和策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他认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的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因此,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正确地制定、掌握和执行政策,是毛泽东科学领导方法的重要内容。

从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制定党的政策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早在 1928 年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在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时,就明确指出:“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 1930 年,毛泽东在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0 页。

义思想而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依据中国的情况制定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他指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①“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②“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1948年,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又及时提醒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⑤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适时地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策略路线。中国革命之初,毛泽东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更注重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更注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社会各阶级及各种政治力量的研究。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出发,逐一分析了现存的各个社会阶级及与之相关的敌、我、友三种政治力量。正是通过对处于中国社会现实经济、政治关系中各阶级状况的仔细分析,毛泽东理清了异常复杂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在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极少、农民人数极多的情况下,制定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农民革命力量为主体,团结其它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力量,集中打击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总的政治策略路线。

关于工人阶级革命需要与农民结成同盟的政治策略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如果能够争取到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恩格斯期望过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也认为只有当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从当时的欧洲国家和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农民在他们的眼中还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同盟军。而毛泽东则从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绝大多数这一特殊历史条件出发,不仅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一支必不可少的同盟军,更把他们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借重农民的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去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举。

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当时的客观实际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同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又必须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依

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① 这里所说的“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其中就包括着各种政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正是依据情况的变化和发展,在革命实践中适时地创造性地制定出许多总的和具体的政策。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政策》、《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论联合政府》等论文和党内指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之后,毛泽东又写出许多论述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文件,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政策和策略体现了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革命的阻力,加快革命胜利的步伐。但是这些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下,又各有不同。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将其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又把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策。事实证明,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土地政策,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以及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都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政策是在革命的总的政治策略的规定下,依时、依地、依情产生的,因而是科学的正确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将原来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具体政策的变化是由国内形势和我党任务的变化所决定的。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配合党的这个基本政治策略和中心任务的实现,我党在具体的土地政策上,暂时放弃没收地主土地,推行减租减息,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保障佃农对土地的佃耕权,但是地主必须减租减息,以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和所受高利贷的剥削。这一具体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争取和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

相反,在制定政策策略路线时,如果不从具体的实际出发,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制定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一定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反对脱离客观实际的两种思想倾向时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①“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逐步成为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一个共同根源就是思想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变化了的时局。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政策无一不给革命带来损失。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是根本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到处生搬硬套,主观主义地制定了一套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果使苏区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②“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③

第二节 掌握政策是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指出:“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④。政策制定出来,要贯彻和推广,领导者掌握好政策就成为关键的一环。

首先,领导者要掌握好政策,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及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情况和政策的充分了解。

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他还说,“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② 刘少奇则明确提出,“必须在某一个工作任务提出以后,在干部中作充分的动员与教育,使干部理解之后,再去进行工作,……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了解任务,工作是无法做好的。”^③ 这些阐述间接或直接地说明了一个道理:领导者一定的理论素养及对情况和政策的充分了解,是掌握好政策的起码条件。作为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对情况和政策的充分了解,那么掌握好党的政策就是一句空话,更谈不上有的放矢地去指导工作。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的阶段,为了克服困难,广泛争取各方力量坚持抗战,我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但是,当时我们的干部中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要正确地掌握和彻底地贯彻这一系列政策,就必须首先使我们的干部都充分地理解我们的政策。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他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0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2页。

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①“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③“自从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④毛泽东进而对其中十项具体政策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和规定。例如,关于土地政策,毛泽东指出,“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766页。

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①正是由于党中央及时地对政策加以说明，对干部加以教育，使得各级干部能够比较充分地理解和掌握党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因此到1941年底，各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其次，领导者要掌握好政策，就必须摆正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与具体政策的关系。

毛泽东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②党的具体政策是总政策的具体化，党的总政策必须通过具体政策方能实现。如果离开了具体的政策，党的总政策只能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如果离开了总的政策的引导，党的具体政策就会忽左忽右，无所遵循。总的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具体政策则具有相对灵活性，两者具有方向上的统一性。应该十分注意不要犯顾此失彼的错误。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以后，党的政策问题就成为决定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毛泽东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6—7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页。

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尽管党中央的路线和基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掌握运用和贯彻执行政策时，却时而发生“左”的偏向，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实行具体政策时忘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因此，必须加以纠正，务必摆正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与具体政策的关系。例如，关于土地改革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在掌握和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必须依照党的土改总政策。总政策规定，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因此，在没收地主土地时，就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土地的地主，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的百分之八左右，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此项百分比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总政策还规定，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分别的。因此，在掌握具体政策时，就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程度的待遇。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再次，领导者要掌握好政策，就必须善于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具体的问题具体地分析。

毛泽东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 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时当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政策的原则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的事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的事业,有其革命的原则性;另一方面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对我们工作所作出的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在实际工作中,正如毛泽东所说:“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② 因此在制定、掌握和执行政策上,都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异,因地制宜,把握一定的灵活性,把革命和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提出“原则性要灵活执行”^③,以克服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以更好地坚持原则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党正是成功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既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又坚持政策的灵活性,才能够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例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2页。

在击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中,必须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政策和军事进攻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政治上,我们严正申明自己的立场,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造成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军事上,进行坚决的自卫反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同时,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在不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下,灵活机动,在某些问题上作出适当的必要的让步。这种革命原则性和政策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就使得国民党顽固派投降不了,反共反不成,输理被动,还必须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使得中间派了解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他们的同情;我们党则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政策、策略掌握得当,照顾抗战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因而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

解放战争后期,我党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但是,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尚未组织起来,社会秩序还有待稳定,立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条件一时还不具备。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新区农村可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先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及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让地主富农多负担;待到具备实施土地法的条件,再进行土改。土改时,又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

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在内。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具体情况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既满足了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又缩小了政治上的打击面,对于迅速稳定新区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

在政策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① 他同时指出,“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② 他进一步提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③ 对此,刘少奇也作出一些比较深入的论述:“决定政策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执行政策也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页。

行,口号的提出与转变,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①“决定政策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政策决定后,要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拿到群众中去执行。……我们的政策,唯一目的是为了群众利益。政策要群众自己去执行,但我们先锋队要领导,不要包办代替。群众没起来,去代替群众,是不对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必须有领导,对群众中的错误意见,要说服教育。不是说,不要包办代替就什么也不做了,尾巴主义、自发论也要不得。”^②

没有哪一项党的政策不是与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作为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学会关心群众利益。毛泽东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③“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④还要学会带领群众自愿去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群众没有起来,要动员群众,积极宣传说明政策。群众发动起来了,要引导群众,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另外,要使群众很好地了解和执行政策,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政策的界限。1948年3月6日,毛泽东针对土改中各地发生的问题说:“无论作什么事,凡牵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领导集团发动和率领广大群众出色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是一条成功的经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困难阶段,我党在根据地内推行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最早由党外人士、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来。毛泽东称赞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我们党采用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但是,当时还有一些同志没有理解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意义。因为认识不够,所以没有认真地积极地执行这项政策。对此,延安《解放日报》针对这项政策展开了多次的讨论。毛泽东特意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毛泽东在社论中详尽地说明了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95—296页。

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①

毛泽东还进一步地剖析了没有理解精兵简政政策的主要原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开展这项工作。他说，“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1—882页。

败了。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①

毛泽东不仅亲自宣传解释政策,做发动工作,而且以他为领导的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也是率先地实施了这项政策。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在1941年冬季,即将原有人数减至76%,1943年又精简了35%,并建立了各种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党中央还特别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带动下,其他解放区也都积极执行了这一政策。精兵简政以后,部队虽减少了一部分人员。但加强了战斗力,更能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的环境;机关、部队人员的减少,一部分非生产人员投入生产部门,不但紧缩了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增加了生产,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卓有成效地宣传、说明、贯彻、执行政策,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增加了他们的政策观念,培养了他们掌握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毛泽东指出,“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② 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经过执行这一实践过程方能得到检验,作为领导者的又一任务,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进行检查,以及时发现问题,补充和修正政策,指导政策的落实。否则,再好的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也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执行偏误或者中途夭折,而我们却全然不知,或知之甚晚知之甚少,导致挽救无力。

毛泽东不仅提出要对政策的执行情况有所检查,而且强调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2—8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及时检查,他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①他还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②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任务的整风运动。到1943年4月,党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是在整风运动中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所花力气又不多,所以在开展肃反工作中,未能准确地认识敌情,实事求是地从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及时发觉并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这样,整风运动才又重新回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道路上来。

检查政策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检查政策的正确与否的标准又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是什么?刘少奇指出:“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①“对的,就有群众拥护;错的,就没有群众拥护。群众反对的、不拥护的,就有问题。”^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更进一步地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③经过40多年的艰苦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充分地证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也使我们充分地领略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总之,检查政策执行情况,随时掌握工作进程,是领导者的基本责任,是正确制定、掌握和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的应有内容。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第九章 民主和集中

第一节 发扬民主，倾听意见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制度，我们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关于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在《论党》中有明确的说明。他说：“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又说：“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

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①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也就是领导骨干和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员的积极性。毛泽东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②发扬党内民主，最根本的是要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要广开言路，使党员群众对党的工作以及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及时地、充分的、准确地反映上来。毛泽东说：“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1）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57—4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529页。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的意见、办法、计划，只能来自群众的实践。领导者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还要拿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因此，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有事同群众商量，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和规律，再去指导群众的行动，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体实施。每一个领导机关直至党的基层组织，都能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就会形成团结的联系群众的骨干力量，引导群众去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发扬民主还在于党员敢于对上级机关进行批评和监督。当年延安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军阀主义等现象，需要肃清。任弼时说：“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斗争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它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的一种重要武器。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②

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必须条件，也是分清原则是非、加强团结、改进领导作风的重要方法。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首先就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下级和一般党员的批评。在革命斗争中，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重大的成绩，但错误也是难免的，例如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第500页。

② 《任弼时选集》，第294—295页。

对政策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或者规定也有错误,对执行政策也缺乏详细的指示,致使下级和一般党员在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等等。因此,有些党员和干部就存有各种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主动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制造机会,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大胆批评,发表意见,甚至有些牢骚也发泄出来。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与反对党严格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扣帽子来抑制党内民主。对于党员的正确批评和意见要接受和采纳;对于错误的批评和意见,要善意地进行解释和说明,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党内民主生活的开展和党的团结的加强。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修改。如果决议、指示确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和党员的意见加以修正。如果下级和党员的意见不对,也应进行解释,把思想弄通。对决议、指示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决定要执行,则必须执行。领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只能带有一般性,特殊区域和特殊情况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提倡盲目执行。刘少奇说:“关于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

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①

当年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实行“三三制”的政策,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这样就有个共产党员与其他人合作共事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反对在工作中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当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② 由于我们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并且教育党员摆正和党外人士的关系,各根据地的政权工作才得以顺利的开展,并为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密切合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加强集中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求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巩固党。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67—4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成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要摆正几个关系：首先要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当个人意见与党发生冲突时，如果自己错了，就迅速改正，如果自己意见对了，也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对自己的意见暂时保留。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组织决定了就要服从。

其次，要摆正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毛泽东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① 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党的整体利益，局部是整体的局部，局部妨害了整体，整体利益就受到损害。例如，实行精兵简政，有的部队要缩编，有的单位要减少或合并，如果摆不正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从自己小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就妨碍了精兵简政方针的贯彻。

再次，要摆正下级和上级的关系。贯彻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在和平环境下，民主可以扩大些，而在战争环境下，要更加强调集中，集中才好办事。在和平环境下，允许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使决定更谨慎，但在战争环境下，不能每件事都开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自觉地服从上级的决定。由于农村环境的复杂性，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特殊情况,决议和指示常常带有一般性、原则性。下级执行时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殊性,研究具体执行办法,如发现决议和指示有错误,或不适合本地情况,则不应盲目执行,要向上级请示报告,这不是反抗上级、闹独立性。

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当时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党政军民之间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例如某些部门向党闹独立性,下级向上级闹独立性,个别同志对全国性问题的随便发言,等等。如果让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妨碍抗战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决定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明确每个根据地有一个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党的委员会成分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

决定也明确了政权系统是权力机关,党委与政权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意义。决定明确指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及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

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有了极大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在望。这种情况要求迅速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并于1948年1月7日发布。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办法；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指示也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及照过去规定每月做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指示明确指出：“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

动和政策的报告,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了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①以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继续督促领导机关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并对请示报告的有关项目以及处理办法做了明确的规定。

正是由于党中央加强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才使党的事业避免了严重的挫折,克服了重重困难,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关系极大,全党同志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②

第三节 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问题。

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党组织在解决重大问题、做出重大决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86页。

时,要召开党委会议集体讨论,不能由个人决定。遇有分歧时,要少数服从多数。防止个人包办,反对一言堂。

党委的集体领导,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是防止片面性、取得正确认识的可靠保证。有了集体讨论,在做决定时,就能估计到一切正面和反面的意见,估计到领导骨干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估计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实践经验,这样,在做决定时就能全面考虑,符合实际情况。而由个人考虑和决定问题,就很难避免主观、片面,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使事业受到损失。

1948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①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进行。

贯彻集体领导的关键在于书记,书记做为班长,要依靠党委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处理好书记和委员间的关系,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交换意见。书记要主动和委员多交谈,多碰头,交流情况,互通情报。对于要研究决定的问题,要事先多酝酿,做好准备。书记要有民主作风,力戒骄傲,多听委员的意见,多听下级的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

见,不要个人决定。刘少奇曾经回忆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工作方式。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很久,他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发生了一个问题,或者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决定,他先不马上开会,而是先找这个同志谈一谈,找那个同志谈一谈,尤其是要和到会的人先谈。他先要问一问,征求一下意见,要同志们去多想一想。如果有不同意见,那就再考虑,酝酿几天,有时候酝酿几个月。等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真同意了,赞成了,然后才开一个会通过。这个通过是真的通过,而且这个会开得也非常简单,很快就把问题决定了,不在会议上辩论。如果事先不酝酿成熟,在会议上辩论很久,解决不了,结果时间也耽搁了,人们的精神也疲劳了,事情也没有搞清楚,即使马马虎虎决定了,将来执行起来也要出毛病。”^① 陈云也谈过毛泽东在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找反对派”这个思想方法。他说:“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谈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毛主席自己就假定过许多反对的意见,别人不推翻,自己来推翻,推翻了再来。上述这些,都是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②

第二,开好会议。党委会议决定重大问题,事先必须通知,发出安民告示,使委员们有充分准备;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会前要有个人商谈;会议要有民主气氛,充分开展讨论,有意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88页。

②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38—39页。

见都摆到桌面上来。这样,才能避免会议流于形式或议而不决。如果会前不通知内容,不交换意见,委员们无从准备,会上又对问题不能充分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决定,实际形成强迫通过。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第三,少数服从多数,又要尊重少数人意见。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党委会议决定问题,也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书记在党委会议上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表决时一人一票,书记也只有一票的权利,绝对不能个人否定多数委员通过的决定,也不容许会后不执行党委的决定。党委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甚至个人的意见。委员来自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有他们自己接触的实际,把大家的看法和意见集中起来,就会得出全面的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认识,这是通常的情况。但是,有时却是少数甚至个人的意见才是正确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手上,对这些意见就不要轻易否定。因此,当会议讨论中发生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当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人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即使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决定,如果发现少数意见是正确的,也应开会再议和修改决定,总之,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各级党委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制度。重大问题,例如带政策性质的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日常性质的问题,则应由分工负责的个人处理。要明确哪些问题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由个人负责,不能大小问题都要开会讨论。集体决定了的事情要由党委成员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对于党委成员职责权限要有严格明确的规定,不能不适当地把权力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要

书记挂帅和拍板，助长一言堂和家长作风；也不能事无大小，无章可循，党委成员不能独立处理问题，遇事只能请示，或互相推诿，影响工作效率，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第四节 正确处理集中和分散的关系

毛泽东说：“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①他多次教育干部，要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工作才能迅速见效。

由于处在农村环境，在根据地建设、军事指标，生产和供给等方面，都存在正确解决集中和分散的关系问题。刘少奇说：“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②

抗日战争的前期，我党的军事任务主要是游击战争，用正规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5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67页。

八路军、新四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点，不能采取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不能实行高度集中，否则就要影响游击战争的灵活性。正规战争和游击队配合作战需要统一指挥；这一个游击区域内，有主力兵团、辅助部队和民兵，也有集中指挥问题。因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在具体贯彻时，有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接受上级的领导，过此限度，上级就不要干涉下级的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游击根据地武装的指挥关系方面，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依照具体情况实施，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就越应扩大下级的权限，适应地方情况的要求。集中行动的部队，内部指挥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明了；部队一旦分散行动，就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情况无从了解。毛泽东在概括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时说：“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①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为了保证这个总方针的实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统一领导，主要是在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建立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强有力的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6—437页。

导机关,统一企业的经营方针和政策,调整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在统一领导原则下,让下面分散经营,并允许以相当的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具体到陕甘宁地区,由于自给工业劳动力分散于党政各部门,加上原料分散,交通不便,考虑到各部门为解决自己需要而生产的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也应该集中起来,无限制地分散也是不对的。对于公营农工商业,要区别大小,大的应集中,小的应分散。小农作事业、小手工业、合作商业及小贩商业必须分散,可以到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集中。至于大屯田、大农场、大工厂、大商店,必须有统一的计划,集中的管理,严格的节制,不能各自为政。在应集中的企业中,也不应集中到边区唯一的机关,而是做出统一计划,交党政军各系统各部门分别经营。

中央早在1940年2月就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到1942年才引起干部的注意并积极实践,直到1942年12月边区高干会才得到一致的承认。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取得巨大的成绩。1945年4月,毛泽东总结说:“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5页。

第十章 培养和使用干部

第一节 全党都要重视干部工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题。毛泽东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很明显，目的就是要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最起码要有两条：一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全党根据这条路线指示的方向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再就是要要有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骨干，党通过自己的领导骨干去组织群众，实现领导。延安时期，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领袖集团，对革命事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

作。^① 因此,在马列主义教育和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着重抓了高级干部的学习和教育。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时认为,造就和培养成千上万的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治党、治国、治军的各级各类领导骨干,也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②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培养、造就大批领导骨干的必要性,并且论证了培养、造就大批领导骨干与走群众路线,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一致性。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许多地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①

1940年11月29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他写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首先论述了干部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也不断的扩大,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全党都要重视干部工作。

第二节 对干部素质的要求

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就是选拔、使用干部时所持的标准。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都对此作了大量的论述。例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为贤’的路线。”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他又指出:“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周恩来于1943年4月22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根据整风精神,指出领导干部应有党性原则,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在革命人生观、坚持原则、相信群众、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及高度的纪律性等六个方面作出具体的表现,为党的纲领、路线去努力地工作。周恩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认为正确的领导者必须经过实际调查,使当地的特点与党的任务联系起来,以确定每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规定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并从实践中检验党的路线和策略是否正确。同时,他还指出,领导者的任务之一,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好组织落实,尤其要慎重地挑选干部,注意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的统一,把领导者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领导干部还应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教育共产党员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要求共产党员无论客观形势发生什么变化,都应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说到修养的标准时,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做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应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它的精神实质,不以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结论为满足,而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导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自己。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根据党的性质和任务,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六条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执行决议;第五,做群众模范;第六,学习。他特别强调不仅每个党员要懂得这些条件,而且必须坚决执行,才算真正具备了条件。在《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文中,陈云针对当时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骄气和有功必居、有过必避的不良

倾向,主要论述了:一、要正确地对待功劳。关键是要摆正个人同人民、同党的关系。功劳首先应归功于人民,第二应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二、要正确地对待错误。有错误当然不好,但只要态度正确,也不要紧。假如有错误,人家讲了就纠正,以后可以少犯错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三、高级干部要带头,全党要造成一个人人讲真理,不讲面子的好风气。

根据毛泽东等在延安时期的有关论述,可以把我们党当时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必须成为学习的模范,熟悉和掌握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全党的学习运动中,特别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要认真学习 and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要了解现状,了解历史,总结和学习别人的经验,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否则,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第二,他们应该是坚决执行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强调,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第三,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的表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他们必须能够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做出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

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在《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①

第五,他们必须是团结的模范。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17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对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作了具体阐述。他指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

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也必须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最后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

在强调要加强党内团结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了要加强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团结,要加强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同其他部分的团结。

第六,他们必须是遵守纪律的模范。越是革命的关键时期,越要加强团结;越要强调纪律性。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

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不仅是人民军队的纪律，也是党的群众纪律。党的群众纪律是巩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领导人民群众执行党的路线，实现党的任务的重要条件。当然也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

延安时期，为加强党的纪律，党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制度和措施。例如，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共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赦罪、开脱的借口。最有影响的，是1937年10月对党的高级干部黄克功枪杀女学生刘茜一案的严肃处理。黄克功早年参加革命，曾参加过长征。到延安后，任抗大6队队长，曾和抗大15队女学生刘茜恋爱，后刘茜转入陕北公学，黄克功于1937年10月5日晚持枪逼婚不成，便枪杀了刘茜。事件发生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经过严肃审理，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同年10月9日，黄克功致信毛泽东，要求念他10年艰苦奋斗，有功于党而留一条性命。毛泽东见信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进行讨论，最后同意边区高等法院的死刑判决，并致信边区高等法院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于当月11日在陕北公学经公审后被处决。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极大地提高了党和边区政府的威信。

为维护党的纪律的严明，中央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党内监督。例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人民利益如受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同时，各级参议会派干部到

群众中开座谈会、调查会，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一旦得到群众反映有公务人员违法乱纪，搞以权谋私，便立即调查处理，决不姑息迁就。党内监督方面，首先是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强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中共中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支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其次是严肃党纪，从严治党，防止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第七，他们要务必保持和发扬脚踏实地，积极肯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对那种“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行为或作风进行了尖锐批评。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对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的精益求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在《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中，毛泽东称赞徐特立：“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①在1945年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闭幕时，毛泽东用中国古代“愚公移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8—99页。

山”的寓言故事，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先锋队，觉悟起来，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奋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延安时期，在这方面，各级领导人都做到了言传身教，时时处处起表率作用。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亲自开荒、种地、修渠，他一再指示有关人员，订生产计划不要忘记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都能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延安时期，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不但把自己的马让出来搞运输，而且还时常背上粪筐积肥。林伯渠身为边区政府主席，在他所住的一孔窑洞里，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他坚持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他政务繁忙，还扛着镢头开荒种地，清早背着箩筐拣粪。谢觉哉老人涓滴归公，甘为人民作公仆。他在1943年为自己定的节约计划是：“1. 建议总务处设公马，我的2匹马加入，估计一年内有10个月可供公家生产用；2. 每月10盒待客烟不要；3. 衣服、鞋子、被单不领；4. 种地1分，种植西红柿20株，秋白菜100棵；5. 晒腌小菜100斤。”徐特立老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边区政府规定发放“老年津贴”，派人将一篮鸡蛋作为津贴，三次送给徐老，三次都被他退回。徐老71岁寿辰时，党中央在给他的贺信中讲：“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称颂他是“艰苦卓绝人中牛。”

第八，他们应该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各种自由主义。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论述。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善于做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

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在《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們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①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第三节 对干部的考察培养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系统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提出了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的问题。

首先,必须善于识别干部。考察、识别干部,看一个干部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其思想政治状况、道德品质、业务水平、工作表现、学习成绩等等是怎么样的,认识和判别他的是非、功过、优劣、好坏,这是使用干部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①这个主要方法要求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待干部。要从干部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的主观印象或先入之见出发,干部的德才表现于他的实践即工作之中,而工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时一事的表现要看,因为他的全部实际是由一时一事积累起来的,并且个别中存在着一一般,但一时一事毕竟只是全部实际的一部分,个别不等于一般,而且人是变化的。只有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才是干部的全部实际情况,表现着干部的德才全貌和整个发展过程,以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为根本依据,并将其同一时一事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识别干部。因此,这种主要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陈云在1938年9月所作的《论干部政策》报告中,用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12个字,高度概括了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其中第一条,了解人,就是善于识别和考察干部,客观、全面、辩证、历史地了解 and 看待干部,既看优点又看缺点,既看长处又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短处,既看过去又看现在,既看本领高低又看本质好坏。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陈云再一次重申了上述观点。这对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千百万革命干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阐述了看法,他认为,不应当形而上学地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要有分析。“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不要因为是革命领袖而肯定他的一切,也不应因为犯了严重错误而否定他的一切,甚至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在《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中,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联系如何学习毛泽东的问题,阐明了如何学习与看待人民领袖的问题。指出毛泽东有一个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他是从封建迷信思想中觉悟出来的,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坚决反对“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当成一个孤立的神”的封建迷信思想。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也提出了对同志要全面评价的问题。他指出,当估计或批评某个同志时,不应仅仅指出他的缺点错误,并当做他的全部,还应指出他的成绩、功劳、长处和他的正确主张。即使他的主张只有一点或一部分是正确的,你们也必须替他指出,不可抹煞,这样才能给这个同志以全盘的估计与批评,才能帮助他进步,使他服气。

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15日所作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了以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其中,调查研究,就是调查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

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后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其次,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使用干部指按照规定的组织程序或法律程序,选拔人员担任某种职务或执行某项任务的行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条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①

陈云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讲到在使用干部时,要气量大、用得好。气量大,就是敢用善用各种人才,象孙中山那样,不分党派成份,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要用,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非如此不能成大事业。用得好,就是放手使用,严格要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使下属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使人敢说话的办法是：领导者态度和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充分发扬民主；对犯错误的人不要随便扣帽子，批评要适当、正确，不要过火和揪住不放。使人敢做事，就是放手鼓励下属充分发挥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自信心，使其敢于负责，工作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陈云指出，随着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当务之急。他提出了要全面地历史地了解和审查干部，挑选、提拔的干部要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守纪律等，以及要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原则；使用干部要遵循“量才使用”，“放手使用”的精神，发挥长处，克服短处；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坚持“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的办法；在干部关系问题上，要以党的原则立场来团结干部，反对家长式地对待干部，同时反对放任干部的错误倾向，此外还提出了加强党内干部团结，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以及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等问题。陈云的意见对于我们党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和干部路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次，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干部与使用干部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爱护干部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干部，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只使用，只布置任务，不指导，不检查，不教育提高，不关心帮助，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不是正确地使用干部，也难以完成工作任务。因此，爱护干部，对于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又是而且首先是党的宗旨问题。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毛泽东历来强调必须爱护干部，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

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时一再指出,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

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为纠正过去中共党内“左”倾的过火斗争的错误和今后如何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刘少奇首先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内斗争的根源及党内斗争的偏向。刘少奇指出许多人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列宁的建党原则，以为党要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民主；党内斗争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要进行不妥协的残酷斗争，这就是党内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一）经常开“斗争会”。这些会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不是为了检讨思想政治问题，而是为了打击同志，对人不对事。（二）把党的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对同志故意搜集缺点，无限夸大，把局部的言行说成全部。不是从思想、原则上去克服党内分歧，而是用对党员的打击、惩办来达到党内的统一，以“杀鸡给猴看”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不允许被打击的同志作任何申辩。（三）混淆党内外斗争的区别，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对待同志，用党内斗争的方法去对付非党干部和群众，等等。这些过火的斗争方式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及其反面的自由主义，影响党内的正常的民主生活，阻碍了同志的积极性、创造性，助长了宗派主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给党带来很大损失。对于今后如何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刘少奇提出，党内斗争要用对党对革命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万不能草率行事；在斗争的方式上，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简单的组织处罚，并不能提高党的纪律；批评要适当，过与不及都要不得。打击同志是剥削阶级的鞭子政策。要允许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有申诉权，禁止党内无原则

的纠纷。

在《解放日报》代表党中央于1941年10月21日发表的社论《决定锄奸政策的出发点》中，社论强调，锄奸政策的出发点，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干部，相信广大群众，以免中了敌人借刀杀人之计。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15日所作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也强调指出，要防止过“左”行动，逼供信错误，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总之，一定要把爱护干部作为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出发点。

第四节 反对宗派主义倾向

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提出严格要求的同时，总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和反对一些错误倾向，以便把工作做好。

除了反对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外，在整风运动中突出地反对宗派主义倾向。

整风运动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宗派主义是在政党或团体的对内对外关系上以宗派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宗派主义的思想实质是个人第一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因此,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联系在一起。其本质特征是自私性与狭隘性。宗派主义表现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是向党闹独立性,表现在个人与同志关系上是拉帮结派。在干部政策上“任人唯亲”,在本部门和外部门的关系上搞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在党内斗争中对待不同意见或犯错误的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总之,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个人的或小团体的私利,为了这种私利,他们不惜损害同志的利益、党的利益,宗派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妨碍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妨碍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组织关系上的宗派主义是同政治路线上的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二者都根源于思想路线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表现为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并要靠后者来保证前者贯彻;同样,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也必然背离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路线。王明、张国焘都是通过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去推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祸害。

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经基本上被克服,但妨害党内团结的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还在党的某些部分中存在着。所谓山头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亲疏关系。自己的队伍亲一些,不是自己的队伍就疏远些。这个山头的干部,熟悉一些,亲一些,另外山头的人不亲,疏远一些。因为有这种亲疏不同,在处理问题上表现有偏差,有不同,有界限,就产生了山头主义。产生这种山头主义是有客观历史原因的,由于党内外小资产阶级成分多,在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游击环境形成的特殊历史、特殊联系和特殊作风,加上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够,一下子消灭也不可能,因此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加强教育,改造山头,最后消灭

山头。

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它严重的脱离群众，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妨害全党团结与统一的，它是一种小团体倾向，因此，必须反对与消灭山头主义倾向。这是必须肯定的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①但在解决办法上则强调教育和自觉。刘少奇指出：“党内的山头主义倾向必须消灭，山头界限也必须消灭，但是在反对这种倾向时，也和反对其他的错误同样，不能采取鲁莽的急性的办法，而必须是首先认识这种倾向的客观存在，分析这种倾向的盲目性及其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耐心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使他们逐渐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逐渐去掉盲目性，才能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这种倾向。只要在各部分同志的内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之后，山头主义倾向才能消灭。”^②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多次批判了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刘少奇在《论党》、《论党内斗争》等文章中也鲜明地批判了宗派主义倾向和行为。这些对于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476—477 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 477 页。

后 记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倡导的科学领导方法,对于广大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联系群众,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年6月1日,是毛泽东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50周年。我们根据学习体会,编写了这本著作,以资纪念,并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本书由宋柏主编,宋柏、刘维林提出写作提纲,各章编写者是:宋柏(第一章、第四章、第九章)、刘维林(第二章、第六章、第十章)、孙奎贞(第三章、第五章)、何晓莉(第七章、第八章)。最后由宋柏统一修改,吴木教授审定。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经学习和参考了有关领导方法著作。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1993年6月3日